

天津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晚清登州府的经济发展与结构变迁

姓名：汪涛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专门史

指导教师：傅美林;侯建新

20040501

论文摘要

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以史实为依据,考察烟台开埠通商以后,晚清登州府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结构变迁,以揭示晚清登州府地区的经济地位与特点。

第一部分介绍了烟台开埠前登州府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经济概况。烟台开埠后,口岸贸易成为强有力的促进因素,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

第二部分讲述开埠通商以后,在口岸贸易和加工工业的发展带动下,晚清登州府地区的农业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促使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

第三部分探讨晚清登州府地区工业经济的变迁。传统手工业不断嬗变,新兴手工业得以崛起,近代工矿业开始出现。

第四部分分析晚清登州府在工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基础上,商品流通量增大,流通结构发生变化,形成以集镇、庙会为初级市场、中心市镇及县城为中级市场、烟台为中心市场的近代市场体系。与此同时,近代意义上的胶东首位城市——烟台开始形成。

第五部分论述晚清商业资本的变迁。传统的钱商资本继续存在但已开始衰落。同时新式的近代商业资本——行栈资本开始兴起。

最后一部分是总结部分,阐释了在口岸贸易的刺激下,晚清登州府地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特点。

关键词: 登州府 口岸贸易 首位城市 行栈资本 结构变迁

Abstract

Following the Historical Marxism,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changes of TengChow Fu in the Late Qing by economic and positive method,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economic position and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is district after Chefoo becoming a opening commercial port.

Part I introduces the physical condition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 of TengChow Fu. After becoming a opening economical port, foreign trade of Chefoo developed and increases rapidly, and it helps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al structure of TengChow Fu.

Part II relates the changes of commodity economy of agricul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rt trading and handicraft industry. With the changes of commodity economy,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 appears in agriculture.

Part III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economy of TengChow Fu in the Late Qing. The changes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industry, the rise of new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the appearance of modern industry are the main characters of industrial economy.

Part IV analyzes the number of goods circulation increasing and the forms of circulation changing, according to the commercial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of the TengChow Fu in the late Qing. The modern market system consists of the primary market in the rural markets and temple fairs, the middle market in the market towns and county towns and the central market in Chefoo. In this way, the primary city in JiaoDong region—Chefoo.

Part V elaborates the adjustment of merchant capital. The traditional capital make out changes. During this period, new kinds of modern merchant capital—Broker's Storehouses started rising.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economic position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 TengChow Fu in the Late Qing.

Key Words: TengChow Fu, Port Trading, Primary City, Broker's Storehouses, Structure Change.

晚清登州府的经济发展与结构变迁 ※

前 言

登州府的烟台是晚清时期北方较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一直到19世纪末,都是山东省唯一的对外开放港口。烟台附近的登州府地区以及整个山东省进出口土洋货,绝大部分要经由烟台。这使得烟台成为当时商人资本汇聚、商品汇流的贸易集散中心。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烟台成为国内南北贸易的中转枢纽,其在国内外贸易中的地位日趋重要。1898年威海辟为自由贸易港,进出口贸易也开始发展。口岸贸易的不断扩大,带动了登州府地区经济的发展及结构变迁,表现在农业的商品化、手工业的转型与近代工矿业兴起、商品流通扩大和近代市场体系出现、商业资本的变迁以及近代意义上山东首位城市烟台的兴起。登州府地区城乡经济不断发展,其专业化、区域化生产日益扩大,逐步形成以烟台为中心的经济区,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

20世纪初,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青岛、大连等其他口岸的开放以及近代交通体系的建立,烟台港的贸易地位开始下降,由原先的独占地位和中转枢纽,转变为辐射范围仅限于山东东北部地区的重要港口。在这种情况下,登州府地区在中国近代市场经济发展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和作用也发生变化。登州府地区一系列的经济的发展及其结构变迁,必然影响到整个山东、渤海湾特别是华北、华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变迁,其经济变迁影响十分突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烟台、威海及青岛所在的山东半岛,在当前成为仅次于长三角、珠三角的第三大经济区,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山东省委、省政府提出了把烟台及胶东地区建成为中国制造业基地,建设以烟台、青岛、威海、潍坊为核心的沿海城市经济带,不断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近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环渤海经济圈的构想,而胶东地区是环渤海地区的重要部分。探讨一百多年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必将对该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小城镇经济发展布局等产生重要借鉴作用。

本文是对晚清时期登州府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变迁进行专题研究。试图探讨晚清时期,以烟台为中心的登州府地区在口岸贸易的刺激下,其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产生怎样的变革,其经济地位如何变化,从一个局部窥测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结构变迁,以对当前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笔者迄今尚未见到专门论述晚清登州府地区经济变迁的论著,所见大都是在山东省这个大的范围内考察时提及,代表性的有安作璋¹、许檀²、庄维民³、王守中、郭大松⁴、从翰香⁵、张利民⁶等。本文采用的资料主要是利用各州县地方志、市志、档案、报刊杂志、文集、笔记、日记等文献。从基本内容看,应当划入中国近代经济史范畴。

※清代的登州府,辖蓬莱(府治所在地)、黄县、招远、栖霞、福山、莱阳、海阳、荣成、文登等县和宁海州,从地域来说相当于今天的烟台市(不含莱州市)、威海市和青岛的莱西市。

¹ 安作璋:《山东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²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³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⁴ 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⁵ 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⁶ 张利民等著:《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一、开埠通商与口岸贸易的勃兴

1、开埠前的登州府

晚清登州府位于山东半岛东北端，地处东经 120° 12′ -123° 42′，北纬 36° 16′ -38° 23′。土地总面积约 18400 平方公里。隔海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相望。

登州，本牟子国，唐置登州，取文登山立名¹。登州，古为东夷族地。夏朝，东夷族建国。商、西周、春秋时为莱国地。战国属齐。秦代属齐郡。汉代为东莱郡。晋为东莱国。南北朝为东莱、长广郡。隋为莱州。唐置登州、莱州。宋、元因之。明洪武六年（1373 年）登州为直隶州，洪武九年升为府，领州一县七，隶山东布政使司。清初因之，雍正十三年（1735）增设荣成县、海阳县，领宁海州，蓬莱县、福山县、黄县、栖霞县、招远县、莱阳县、文登县、海阳县、荣成县，府治蓬莱，属登莱青道，隶山东布政使司。1858 年 6 月，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天津条约》，辟登州等 10 处为通商口岸。1861 年 5 月，清政府批准改定烟台为口岸，8 月 22 日清政府派员在烟台主持对外开放仪式，同时宣布筹建东海关。此后，英、法、美等 17 个国家陆续在烟台设领事馆。1862 年 2 月 14 日，登莱青兵备道由莱州移驻烟台，道台崇芳兼任东海关监督。1904 年改称登莱青胶道，辖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和胶州。民国初年，改称胶东道。

登州府大部分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与同纬度内陆地区相比具有雨水适中，空气湿润，气候温和的特点，可谓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但在东部沿海的荣成县受海洋气候影响较深，属于海洋性气候。登州府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为 660 毫米左右，年平均气温约 12℃，年平均相对湿度约 70%，年平均日照时数 2700 小时左右，太阳辐射总量年平均值大约 5224.4 兆焦耳/平方米，年平均风速内陆地区 3~4 米/秒，沿海地区 4~6 米/秒，年平均无霜期 210 天左右。

登州府地区三面环海，“舟航之利捷于他郡”²。海岸线长约 1500 公里。沿海港湾、岛屿众多，自古渔盐业十分发达。“沿海居民多以捕鱼为业”³。海运交通发达，拥有众多优良的贸易口岸。登州在古代是重要的港口。在唐朝就是北方与新罗、日本通商的最大口岸，同时也与辽东半岛进行海运贸易。商业十分兴旺，大批货物通过海路运往辽东、新罗、日本等。登州也就吸引了众多的外域客人。如建有专供新罗人居住的“新罗坊”和安寓新罗商人的“新罗馆”。登州也成为攻打高句丽的造船中心和水军集结地，登州水城就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元朝海运新航线的开辟，对于登州府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芝罘、成山、刘公岛、石岛、里岛等地成为物资集散中心和商业口岸，经济地位大大提高。

优良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农林果业的发展。早在春秋时期，在登州府地区的蓬莱、黄县等以小麦种植著称。在明朝时，水稻种植开始扩大。棉花、烟草、花生等经济作物也广泛种植。在福山、莱阳等地的苹果、梨等水果种植十分广泛和有名。此外，林业、药材、畜牧业、桑蚕业也比较发达。登州府属各县“均以养蚕为业，种柞木为本，依此山茧以为养生之源”⁴。栖霞县种柞树，饲山蚕乃是“康熙二十年诸城人教之”，到乾隆时已相当普遍了⁵。

¹ 岳濬等修纂：《山东通志》卷一，1736 年刊。

² 贾瑚等修纂：《增修登州府志》卷六，风俗，1881 年刊。

³ 贾瑚等修纂：《增修登州府志》卷二一，盐法，1881 年刊。

⁴ 孙钟廷：《山蚕辑略》序，转引自孙祚民：《山东通史》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426 页。

⁵ 黄丽中修：《栖霞县续志》卷一，物产，1879 年刊。

登州府地区，以低山丘陵为主，山丘起伏和缓，沟壑纵横交错，大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山体多由花岗岩组成，海拔在 500 米以上，最高峰为崑崙山，海拔 922.8 米。矿产资源十分发达，主要有金、银、铅、铁、煤等。并且较早的开始大规模开采。据宋代元丰年间统计，登州年产铁约 3,774 斤，莱州年产铁量约 4,290 斤。登莱也是重要产金地区。仁宗时开始开采，每年黄金产量增加数千两。四方之民慕利聚集金矿者，不下数万人。元丰年间金课总收计 10,710 两，而登州计收 4,711 两，莱州收 4,872 两，两地合计达 9,583 两，约占全国金课总额的 90%。可以说宋代全部金产都在登莱二州¹。至元五年（1268）元廷命益都漏籍民户 4,000 户，于栖霞县淘金，每户输金岁 4 钱，共输金 1,600 两。栖霞县年产金 5,280 两²。

登州府地区自古手工业就比较发达。自战国时期，冶铁业、漆器业、纺织业、缫丝业、造纸业、酿酒业等不断发展。比如“农作外，间治蚕桑，铺眠分拾之劳，属之田妇；练丝之役，多男子共事”³。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说，“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⁴《登州府志》记载，“楮，皮可为纸，莱阳、宁海多业此”⁵。

登州府的商业也比较兴旺。府境“地狭人稠，境内所产不足以给，故民多逐利四方，或远适京师，或险泛重洋，奉天、吉林，绝塞万里皆有登人”⁶。黄县人经商于外者“辽东为多，京师次之”⁷。莱阳商人“资之饶者置货于京师、金陵、苏杭”；文登商人“北游燕蓟，南走江淮，交易起家，贸迁成业”⁸。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城镇的兴起。以黄县为例。同治年间任东海关监督的龚易图对其有这样的赞誉：“近岁以来言东海富庶之区者曰惟潍与黄，其科名文物之美，冠纓世族之盛仪二邑为最。”⁹黄县市场上粮食来自东北，棉花来自江南，“闽广苏杭西洋巧丽之物靡不毕陈”。该城商业以西关为最盛，“列肆数百”家，仅银钱之肆即多至数十。坐贾之外，四关厢又各有集期，“市粮市果常在南关，市木市牛马驴骡常于东关，市蔬菜瓜常于东街，市薪常于西关”，百货则“各随所期之日以为所市之地”。黄县居民经商为业者人数众多，“大贾则自造舟贩鬻，获利尤厚”；小商小贩多“百十为群，以骡驴负货而至”¹⁰，本地产品的汇集输出，外来商货的转运分销多有赖之。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登州府地区的人口也逐渐增多。唐朝初年，有户 22,298，口 108,009。明朝嘉靖年间，有户 87,443，口 881,371。嘉庆二十五年（1820）有 1,912,501 口。光绪年间，有户 393,437，口 2,291,772¹¹。

2、开埠通商与口岸贸易

烟台位于山东半岛北端，地处黄海之滨，具有良好的港湾条件和丰富的腹地资源。烟台港向东和东北方向敞开，芝罘岛横卧其北部，形成港湾天然屏障。自秦汉以后，烟台就以“芝罘”名闻于世。明代为防御倭寇的侵扰，曾设立奇山守御千户所，并设置烽

¹ [明]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三三七，食货，中华书局，1957 年。

² [明]宋濂等修纂：《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6 年。

³ 施闰章等修纂：《登州府志》卷四，风土志，1694 年刊。

⁴ [陈]徐陵：《玉台新咏》序，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年。

⁵ 施闰章等修纂：《登州府志》卷八，物产，1694 年刊。

⁶ 贾瑚等修纂：《增修登州府志》卷六，风俗，1881 年刊。

⁷ 尹继美等修纂：《黄县志》卷三，食货志，1871 年刊。

⁸ 万邦雄等修纂：《莱阳县志》卷三，民业，1678 年刊；李祖年等修纂：《文登县志》卷二，风俗，1922 年刊。

⁹ 尹继美等修纂：《黄县志》卷首，龚易图序，1871 年刊。

¹⁰ 尹继美等修纂：《黄县志》卷三，食货志，1871 年刊。

¹¹ 贾瑚等修纂：《增修登州府志》卷十八，户口，1881 年刊。

火台传报军情，此后人们常以“烟台”之名指称芝罘港湾地区。

但烟台开埠以前，从登州府整个地区的经济看，与全国一样，一直保持着两千多年来所形成的传统封建经济的主要特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¹

其后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渐有帆船来泊，芝罘成为重要的集镇，开设商号“三二十家”，“其入口不过粮石，出口不过盐鱼而已”。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大规模发展，位居渤海湾入口的烟台遂成为商船往来出入的必经之地，各帮商人多来此贸易，帆船停泊渐多；经常往来于此的商帮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等；到道光末年，在烟台开设的商号已达千余家了²。据咸丰九年（1859）山东沿海14州县海口征收税银的统计，福山县的税额达12,123.596两，占14州县总额的28.67%，其税额最高。咸丰九年郭嵩焘的报告称：“烟台为南北之冲，海船经过收泊较多与他处，故以此一口（收税）为较盛”。³此时，烟台在沿海贸易的地位已超过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港口。

烟台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在鸦片战争前后就引起了西方商人的注意。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在1865年烟台贸易报告中写道：“在《天津条约》签定之前，烟台的贸易已表明它是一个重要之地”“将近三十年来，它和渤海湾的其他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⁴当时有不少外国商船到登州及沿海各处贩运鸦片，然后装豆南下，不断进行经济渗透。有些外商不仅“停泊贸易”，而且串通华商“买地造屋”⁵，营建永久性贸易场所。对于外商的走私活动，清政府采取严禁方针。1843年曾两次严令山东巡抚梁宝常，不准各海口商贩与洋商私相贸易，外国船只进入非通商口岸者，一律将船货没收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61年8月22日烟台设东海关，开始征税。此后烟台港便正式对外开放。1862年3月，清政府将登莱青道由莱州移驻烟台，以监督东海关事务，并开办户关，统管山东沿海的税金和厘金。

烟台辟为通商口岸后，因所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占水陆运输要冲之便”，与北方诸港相比，还有气候温暖，冬季不结冰等优点，“故船舶往来，四时不绝，帆樯林立，货物辐辏，买卖极盛”⁷。从19世纪80年代起，烟台逐渐成为欧美和东亚各种舶来品以及北方地区各种出口土货的重要集散市场。

烟台港口岸贸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港口进出港船舶数，港口吞吐量以及口岸贸易额，都比开埠前有大幅度增长。1864年烟台开埠之初，进出港船舶数为900艘，船舶吨位近28万吨。1865-1880年，港口年平均进出港船舶数为1,200艘，总吨位54万吨，年平均货物吞吐量13万吨。1881-1894年，烟台年平均进出港船舶数增至1,950艘，总吨位增至158万吨，年平均货物吞吐量达到20万吨⁸。口岸贸易一直呈平稳增长之势。

烟台口岸贸易基本由洋货进口、土货进口、土货出口三项构成，贸易市场分为国内市场 and 国外市场，洋货进口、土货出口以及土货进口与两个市场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¹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624页。

² 于宗潼等修纂：《福山县志稿》，卷五，商埠志，1931年刊。

³ 郭嵩焘等：《查明海口税务情形并遵酌设厘局折》，咸丰九年，转引自丁抒明《烟台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⁴ 英国驻烟台领事馆《1865年烟台贸易报告》，转引自丁抒明《烟台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第35页。

⁵ 贾桢等修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中华书局，1979年，第1537页。

⁶ 《清宣宗实录》卷三九四，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华书局，1986年。

⁷ [日]日清贸易研究所《清国通商综览》，1891年，上海，第228-229页，转引自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30页

⁸ 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6页。

表 1-1 1864-1900 年烟台港进出口贸易统计表¹

年代	洋货进口净值	土货出口净值	土货出口			贸易总净值
			往国外	往国内	总计	
1864	1,580,065	1,465,530	890,147	1,868,400	2,758,547	5,804,142
1870	4,532,115	1,191,392	704,669	1,574,256	2,278,925	8,002,432
1875	3,525,094	1,993,461	138,698	2,129,515	2,268,213	7,786,768
1880	4,162,727	2,345,411	79,101	3,318,576	3,397,677	9,905,815
1885	4,427,505	2,079,871	175,102	3,901,008	4,076,110	10,583,486
1890	5,811,206	2,236,280	394,801	4,420,095	4,814,896	12,862,382
1895	7,316,536	2,777,528	740,919	6,660,058	7,400,977	17,495,041
1900	11,084,758	5,570,863	1,954,781	8,447,926	10,402,707	27,058,328

注：1864-1874 年为芝罘两，1875 年后为海关两。1864 年后，烟台开始有海关统计。

开埠后，在国内市场，烟台保持并发展了与汕头、福州、宁波、广州、厦门等南方港口的传统贸易，进口以糖、纸、茶、棉花、夏布、桐油等为大宗，出口大宗多为豆类、豆饼、果品、药材等，其中豆类及豆饼的出口居首位。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后，烟台与上海之间的贸易勃兴。上海成为烟台主要的土洋货输入港和土货转口输出港²。烟台同天津、牛庄等渤海湾沿海口岸的贸易，在开埠后也有较大发展。随着胶东地区榨油业、粉丝业、缫丝业及织绸业商品化生产的兴起，烟台每年都要从牛庄等地进口大量豆货、柞蚕茧、木材及杂粮，供本地手工业生产之需。

烟台同国外市场的贸易（即直接对外贸易），基本上以英、美、日、俄、朝鲜等为主，但在甲午战争之前，大部分贸易依赖国内市场转口，同国外市场的直接贸易只占很小比重。1893 年烟台“所有洋货进口价值，此数（按直接从国外进口数）仅居十之三成，其七成则系由上海进口”³。1894 年后，烟台对国外市场的直接贸易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烟台大宗洋货进口，主要商品有鸦片、棉布、棉纱、毛织品、五金、煤、煤油、火柴、粮食、糖、海菜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开始大量涌入烟台港。鸦片从 1864 年的 1,402 担，增至 1870 年的 4,194 担，1874 年达到最高 4,476 担。80 年代后，由于国内种植增多，进口减少，一般在 500 担以下。进口棉布，1867 年仅 3.5 万匹，1890 年猛增到 130 万匹，一般占进口洋货总额的 40% 左右。棉纱 1874 年不过千余担，80 年代后，进口量成倍增长，1880 年进口洋纱 11 万余担，1890 年超过了 100 万担，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 20% 以上。1898 年洋纱进口达到 245 万担，甚至超过了棉布，居进口洋货价值的首位。毛呢和毛织品，最初进口仅五六千匹，70 年代增加到三万匹左右，以后保持在万余匹。大量外国纺织品的进口，强烈冲击传统土布土纱的生产。在广大乡间，普遍出现用洋纱代替土纱织布的现象。此外，烟台以外国旧铁为主的五金进口，60 年代每年进口 2 万担，到 19 世纪末增加到 22 万担，替代了原来使用的山西铁。煤油进口主要来自美国，最初只用于点灯，后来也用于工业生产。1874 年进口量为 10 余万加仑。1894 年达 183.4 万加仑。1906 年增加到 543.2 万加仑，价值 80.6 万海关两。与此同时，许多豆油灯被煤油灯所取代。火柴的进口改变了民间使用火镰的习惯。进口洋货中还包括各种食品和日用品。如糖类，1900 年进口各种糖 21.4 万担，1906 年为 36.9 万担。从 90 年代以后一度有相当数量的美国面粉进口，1892 年仅为 2,476 担，到 1898 年增加到 10.9

¹ 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 4-7 页。

² [日]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 2 辑，1908 年，第 87 页，转引自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变迁》，中华书局，2000 年，第 35 页。

³ 上海通商海关造册处译：《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上卷，1893 年，烟台口，第 45 页。

万担，1900 年上升到 43.8 万担。海产品，烟台从开埠初期的不足千担，到 1866 年增加到近 10 万担，1872 年增加到 17.6 万担，以后每年在 10 万担以下。烟台 1900 年进口染料的价值在 20 万两以上¹。

与进口贸易相比，出口贸易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较小，且都是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烟台出口的土货产品主要是豆类及加工品、丝及丝制品、草帽辫、粉丝、药材、渔产品、花生、枣等。其中前四类是最重要的出口品，出口值约占整个出口值的 85-90%。

豆货是出口的重要商品，开埠前就是传统出口项目，远销华南和东南亚地区。烟台开埠的最初 10 年，大豆、豆油及豆饼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50% 以上，1869 年达到 52.34%。1872 年出口豆饼为 73 万担，1894 年达到 123.8 万担，同期豆类出口的数量分别为 48.7 万担和 125 万担，豆油分别为 1.5 万担和 952 担。由于沿海地区油坊加工业的兴起，对豆类原料需求增大，出口量减少。19 世纪 80-90 年代，豆货出口值维持在 100-110 万海关两之间，约占土货出口总值的 20% 左右。药材的出口占有一定的比重。烟台的出口数量一般在万担以内，1875 年曾达到 1.3 万担，以后仍保持在八九千担左右。烟台枣的出口，1864 年是 87,485 担，此后一直保持在四五万担左右。

此外，烟台有特色的出口商品是柞蚕丝、丝绸和草帽辫。柞蚕丝是登州地区的传统产品，但其生产、缫丝等技术落后，最初出口量很小。外国商人到烟台考察后，在烟台首创缫丝局用机器生产，使其符合世界市场的需要，带动了缫丝业的发展。生丝和丝绸在国外市场的销路日益扩大，许多洋行在烟台开办购运丝绸的业务，华商丝栈也纷纷设立，丝绸出口量迅速增加。蚕丝和丝绸，也成为烟台的主要出口商品。1872 年出口各类生丝和丝绸分别为 1,279 担和 1,175 担。1881 年两项出口分别增至 5,750 担和 1,722 担。1894 年分别为 11,765 担和 1,981 担，到 1900 年达到 23,115 担和 2,588 担，1910 年为 27,847 担和 7,394 担。山东草帽辫业开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产量居全国首位。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包括直隶、河南和陕西各地的草帽辫几乎都集中在烟台出口。开埠初期不过千余担，1869 年 5,432 担，1872 年增至 1.5 万担。1880 年为 33,368 担，占全国草帽辫出口数量的 68%，其价值 111.6 万海关两，占烟台原货出口总值的 32.8%。自该年到 1894 年，烟台草帽辫年输出量近 42,000 担，其中 1887 年达到最高峰，出口 65,696 担，价值 214.5 万海关两。烟台港成为全国最大的草帽辫出口港。粉丝出口是烟台的特色，每年一般占出口总额的 10% 左右。1866 年烟台出口 4 万担，到 1890 年增至 15 万担。烟台的花生出口最早出现在 1891 年，不过 2,250 担，随后迅速增加，1894 年增加了 9 倍，达到 2.6 万担，1900 年增加到 10.8 万担，形成大量出口的态势。烟台海产品的出口主要有咸干鱼、虾米、虾干等。1863 年仅为 3,000 担左右，以后逐年增加，到 1900 年增长到 5.2 万担²。

一直到 19 世纪末，烟台都是登州府乃至山东唯一的通商口岸，烟台成为商人资本会聚、商品汇流的贸易集散中心，有力促进了烟台及登州府地区城乡经济的迅速发展。

但 1906 年是烟台口岸贸易的一个分水岭，从此贸易形势由盛转衰。口岸贸易额、进出口船舶数等都发生变化。

从进出口贸易总额看，从 1905 年达到最高峰，此后总的趋势是下降的。1906 至 1910 年平均每年递减 500 多万海关两；1901 年是烟台进口洋货最多的一年，此后逐年下降，平均每年递减 100 多万海关两。而同期土货出口，略有增加趋势，从 1907 年开始，土货出口超过了洋货进口，这是一重要特点。土洋货进口的减少和土货出口的增多，以及进出口船舶数的减少，都说明烟台在国际国内贸易中的地位下降了。

¹ 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 137 页。

² 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 137-138、170-171 页。

其主要原因在于 20 世纪初,新开放的青岛和大连等港口,随着现代化的港口设施和与内地相通的铁路的建设,对烟台贸易构成了致命威胁。

表 1-2 1901 年至 1911 年烟台港进出口贸易表¹ 单位:海关两

年份	洋货进口	土货进口	土货出口	贸易总额	税收	进出口船舶数
1901	19,256,466	6,533,043	11,871,001	37,660,510	764,999	5,825
1902	18,297,486	6,111,047	11,515,880	35,924,413	815,849	5,833
1903	17,411,980	7,256,535	13,515,397	38,183,912	802,086	5,539
1904	12,773,142	8,795,879	12,686,154	34,255,175	731,201	3,834
1905	17,156,771	10,022,488	11,952,125	39,131,384	871,607	4,871
1906	14,799,778	7,977,090	11,963,399	34,740,267	818,322	6,498
1907	10,630,697	7,296,744	10,719,072	28,646,513	633,243	5,942
1908	9,887,640	6,961,319	11,136,403	27,985,362	644,914	5,757
1909	9,845,495	10,333,059	18,243,071	38,421,625	748,338	5,472
1910	8,048,814	7,415,345	14,731,624	30,195,783	651,265	5,451
1911	8,175,488	8,478,538	13,916,518	30,570,544	595,914	4,988

随着设施先进和交通便利的大连港建成和投入使用,烟台港在北方航运中的中转枢纽作用减弱了。东北的大批进出口货物不再通过烟台转运,而改由大连等港集散了。随着青岛港的开放和胶济铁路的通车,烟台在山东也失去了对外贸易中的独占地位,并且在青岛港的竞争下陷入了衰退状态。而青岛成为山东进出口贸易的流通主渠道。《福山县志稿》记载说:“自大连开而油饼之业为所夺,所余二十余家,供本地之用而已。青岛开而草帽辫遂绝迹焉。”²

表 1-3 烟台、青岛港贸易量比较(1899-1911 年)³ 单位:海关两

年份	烟台		青岛	
	贸易净额	所占百分比	贸易净额	所占百分比
1899	28,153,956	92.72	2,210,164	7.28
1901	37,660,510	81.18	8,730,920	18.82
1903	38,183,912	72.34	14,598,411	27.66
1905	39,131,384	63.68	22,322,680	36.32
1907	28,646,513	50.01	28,637,889	49.99
1909	38,421,625	49.18	39,705,084	50.82
1911	30,570,544	39.85	46,141,657	60.15

威海位于山东半岛东北端,与辽东半岛旅顺、大连隔海相望。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是北方良港之一,自古即是重要的军事重地。“威海一卫,距登郡极东,东接高丽,南通日本琉球,北达奉天天津,岛屿联络,刘公最险,为江浙七省通商要路。货船停泊海寇动掠,每从此发,诚宁文之屏蔽,登郡之门户而帝都之咽喉也”⁴。光绪年间,成为清朝北洋水师的海军基地。1898 年,清政府签订《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英国强租威海,将威海港辟为自由贸易港,此后,进出口贸易逐渐增多,市面日渐繁盛。

¹ 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 6-7、18、67 页。

² 于宗潼等修纂:《福山县志稿》卷五,商业,1931 刊。

³ 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 15 页。

⁴ 王士任等修纂:《威海卫志》卷九,艺文志,1742 年刊。

从进口货物种类来看，主要是木材、玉米、烟草、棉纱、布匹、煤油、粮食等，出口货长期以花生、盐、蚕茧为主。花生出口始于20世纪初，1906年出口3.86万担，1909年增至13.9万担¹。英国占领时期，威海有盐田6,000余亩，输出量约占总产量的70%，出口以朝鲜、日本为主。1902年，威海港进出口船数146只，吨位为151,809吨。1909年进出口船数增至567只，吨数为481,000吨²。

口岸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扩大、贸易量的增长，使贸易成为一种强有力的促进因素，带动口岸与腹地的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商品流通已不再局限于市镇集市和区域性市场，围绕口岸进出口贸易形成的商品流通格局，扩大了商品流通的范围，服务于口岸中心市场的中转市场相继兴起，内地初级市场的商品集散功能得以增强，这就为近代市场贸易流通体系在晚清登州府的形成奠定基础。

口岸贸易造就了新的商品流通结构，也就带来了新的需求和新的消费者。在烟台迅速增长的消费人口，其消费方式和消费选择都必须依赖市场。“土货所入者，不计洋货十分之一，而洋货销路之广，较土货倍蓰焉。今试游览市面，见各商号所罗列者，何一非洋货，无论各洋行、各细货行，购者、卸者舍洋货外无他种。即从前绝不贩运之家，如亮点，今则洋面居其半矣；如蜡铺，今则洋烛居其三分之一矣；如药行，今则药水居十之三四矣”³。新商品的使用改变了物质生活的样式。同治以前，黄县家居照明一向用豆油灯或牛油蜡烛，1894年“始用玻璃罩火油灯”，后来“用者日广，豆油灯废而不用”；过去引火用火镰火石，“光绪初年，外国火柴输入，民皆便之”，很快取代了火镰火石。在衣着方面，“在昔妇女专纺织，洋货甚少，故常用者为土布，洋货只有哈喇羽毛绸数品，为男子外衣。后渐有花旗布等，土布日少，清末，花色种类渐多，国产日稀”⁴。市场流通和消费领域中的一系列变化，必然会在生产领域引发连锁反应，也就为晚清登州府城乡工农业生产开辟了一个新的广阔市场，带来新的发展契机。这就带动了晚清登州府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商业资本经济结构的变化。

¹ [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青岛出張所：《青岛开港以来山东省经济的发展》，1939年，第10页，转引自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74页。

² 安作璋：《山东通史》（近代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7页。

³ 阙名：《烟台商业之沿革》，《山东杂志》第38期，1909年。

⁴ 阙名：《黄县志》，卷四，实业，经济，1945年刊。

二、晚清登州府农业经济变迁

1、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晚清登州府口岸贸易的兴起和近代手工业的充分发展,促进了登州府地区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推动农业经济朝着集约化、区域专业化以及商品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并以此促成农业经济内部发生一系列变迁。

晚清登州府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突出表现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与生产区域专业化的形成和扩大。早在烟台开埠前,登州府的商业性农业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某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已带有某种专业化色彩。烟台开埠以后,在国内外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农业经济作物的专业化、商品化经营趋势有了进一步的增强。

道光年间,花生种植逐渐传至登州府地区。“闽商庄慕陶自福建带来长生果一袋,献给归省知府李宜升为寿礼,李家植于黄金洼,为本县花生种植之始”¹。当时种植的花生品种为龙生型品种,即小粒种。其特点是生长迟、产量低,试种性差,因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种植规模和范围的扩大。19世纪60年代,美国普通型大粒花生开始传入登州地区。美种花生引入后,因其产量高、品质优,获得了较快的传播。莱阳原先只种小粒花生,“光绪末,又有自外洋来者,颗粒较大,种植尤多,占全境农田十分之一”²。莱阳、海阳、牟平盛产花生,产量很大³。1914年,在山东第一次物品展览会上,招远、黄县等地种植的大花生获奖⁴。30年代前期,登州府花生种植面积约占耕地面积:海阳为34.3%;栖霞为19.8%;文登,凡有地5亩以上的农户,即有1.5亩农地种植花生⁵。荣成县有近1/4的耕地用来种植花生。英国强租威海卫后,港口开放,花生出口量增加,种植面积扩大。一般自耕农除保证自食粮食外,尽量多种花生,花生种植面积约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3%。1891年花生出口不过3,300海关两而已,但1910年出口达34万海关两。1912年超过100万海关两⁶。登州府成为大花生专业化集中产区。

豆类在开埠前即为登州府地区的重要农产,“青豆、黄豆、黑豆皆可榨油成饼,豇豆、绿豆、豌豆、小豆皆可制粉”⁷。豆类及豆饼、豆油等加工品成为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开埠后,出口发展更快。1876年前,豆类出口值约占出口总值的50%,豆类大量出口推动了豆类种植面积增加和产量提高。

登州府自古为蚕桑之地。从清代起,柞蚕业蓬勃发展。乾隆年间宁海州张崧《山蚕谱序》记言,“登莱山蚕盖自古有之,特前此未知饲养之法,任其自育于林谷之中,故多收则以为瑞。宋元以来其利渐兴,积至于今人事益修,利赖日广。立场畜蛾之方,纺绩织口之具,踵事而增,工口桑麻矣”⁸。登州府属各县“均以养蚕为业,种柞木为本,依

¹ 新编《海阳县志·大事记》,转引自陈凤良、李令福《清代花生在山东省的引种与发展》,载《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

² 梁秉锟等修纂:《莱阳县志》卷二,实业,物产,1935年刊。

³ 刘素芬:《烟台对外贸易分析》(1867-1919),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5页。

⁴ 山东展览会报告编辑处编:《山东第一次物品展览会审查报告书》,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171-177页。

⁵ 国立山东大学化学社编:《科学的山东》,农业,青岛,1935年,第1-3页、17-18页;隋德民:《山东文登县农村市场概况调查》,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8日。

⁶ 刘素芬:《烟台对外贸易分析》(1867-1919),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5-77页。

⁷ 梁秉锟等修纂:《莱阳县志》,卷二,实业,物产,1935年刊。

⁸ 舒孔安等修纂:《宁海州志》卷二五,艺文志,1864年刊。

此山茧以为养生之源”¹，曾有“一亩蚕，十亩田”的谚语。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柞蚕业已遍及整个登州府。当时文登“村民厚利，莫如柞树”，“由柞之山谓之蚕场，春蚕出自秋茧，秋蚕出自春茧，若风雨以时，阴阳和调，春秋两收，其利什倍”²。宁海州养柞蚕，春秋两作，“春茧成于八月，俱有茧市”³。蚕茧成为集市上的重要商品。“秋茧上市，为各乡集最盛时期。龙泉汤、崖子、冯家、黄疃……等集，皆为茧之聚处，而崖子尤盛”⁴。20世纪初，仅威海一地就有8,000多亩柞树，所产柞蚕茧大都运往烟台，由烟台缫丝工场缫丝出口⁵。光绪年间，登州府柞蚕业发展至鼎盛，文登、莱阳、栖霞、福山等处，“养柞蚕者，十家居其八九”⁶。当时柞蚕业年产值在10万银两以上的县有荣成、文登、宁海、福山、莱阳等县⁷。登州府地区已成为柞蚕的集中产区。

桑蚕业在登州府也不断发展，但与柞蚕相比，种植较少。“桑，黄县、福山有业蚕者”⁸。在牟平“玉林、午极、冯家各集，桑茧亦能成市”⁹。

宁海、黄县、栖霞等州县在同治年间也都陆续引种烟草。《宁海州志》记载，“烟草……圆户多蒔种以利”¹⁰。1910年，英美烟草公司在威海孟家庄开始试种美烟。引种工作最初由美籍技师穆尔主持，另有数名外籍技师参与田间栽培指导事宜¹¹。

登州府地多山区、丘陵，药材种类繁多，产量丰富。“滑石，蓬莱县出，县东百里桂府村者尤善；石膏，蓬莱县处；石决明，生海岛中，土人采肉以为饌；麻黄，多出海岛中；黄芩，生崑崙诸山中；昆布，出登州；海带，出登州，医家用之；龙刍，出登州；牛黄，出登州，唐东牟东莱二郡贡物”¹²。

在莱阳“沙参为邑农业重要副产”“药材以沙参、半夏、附子尤佳，而沙参为出口货大宗”。清末莱阳沙参“年产约二十余万斤，斤值银币七、八角”，仅此一项年收入即达银元十四五万。其他如半夏、蝉蜕、槐米、杏仁、蜂蜜、黄精、远志、苍术等也大量输出¹³。登州府之招远、栖霞等县“富厚之家”有经营药材业者，“收买防风、黄芩等药材”输往南方¹⁴。招远县所产药材有四五十种，如：黄精、苍术“邑产者良，南中人多收买之”；“远志，生太山及冤句川谷，近邑产通用；元参，生河间川谷，近通用邑产”；黄芩、防风“邑产者良，南中人多收买之”；“黄麻，黄山馆后者胜，招邑近馆者功同”；“扁蓄……邑产者胜”；半夏“邑产最盛”¹⁵。栖霞县药材亦有40余种，其中“紫草、防风、黄芩、柴胡之类南方不产者，鬻于海客颇获利”¹⁶。宁海州所产沙参“冬月种以沙地，再逾年五、六月采，皮叶亦可食，估者收买鬻于商舶”¹⁷。在荣成，“药物惟荣最盛”，有“苍术、黄

¹ 孙钟廷：《山蚕辑略》序，转引自孙祚民主编《山东通史》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6页。

² 李祖年等修纂：《文登县志》卷十三，土产，1922年刊。

³ 舒孔安等修纂：《宁海州志》卷四，食货志，1864年刊。

⁴ 宋宪章等修纂：《牟平县志》卷五，政治志，蚕业，山东印刷局，1936年刊。

⁵ Forsyth R.C.,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1912, p.104.

⁶ 陈咏堂：《调查山东农业记》，《中华实业界》第2卷第11期，1915年11月。

⁷ 山东展览会报告编辑处：《山东省第一次物品展览会审查报告书》第2编，第3章，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

⁸ 施闰章等修纂：《登州府志》卷八，物产，1694年刊。

⁹ 宋宪章等修纂：《牟平县志》卷五，政治志，蚕业，山东印刷局，1936年刊。

¹⁰ 舒孔安等修纂：《宁海州志》卷四，食货志，1864年刊。

¹¹ 山东林业技术员训练所编：《山东农业概要》，1947年，第15页。

¹² 施闰章等修纂：《登州府志》卷八，物产，1694年刊。

¹³ 梁秉钊等修纂：《莱阳县志》卷二，特产，1935年刊。

¹⁴ 郑占春等修纂：《栖霞县志》卷一，风俗，北京线装书局影印本，2001年；张作砺等修纂：《招远县志》卷四，风俗，1600年刊。

¹⁵ 张作砺等修纂：《招远县志》卷五，物产，1600年刊。

¹⁶ 卫枝等修纂：《栖霞县志》卷一，物产，1754年刊。

¹⁷ 舒孔安等修纂：《宁海州志》卷四，食货志，1864年刊。

芩、葛根、天花粉、金银花、防风、沙参、桔梗、柴胡灯”¹

登州丘陵地带苹果、梨、葡萄、桃、山楂、栗子、柿子、核桃等果树比较普遍。莱阳梨“皮粗糙而无渣滓，肉则清香脆甜，每熟时，商贩麇聚，分运青岛、烟台、济南，远及平津辽沈沪粤等处”²。但作为商品则受到市场、运输、品种和技术等限制。开埠以后，随着新品种、运输条件的改变和城镇市场的扩大，促进了水果的生产，成为部分农民的重要经济来源，并出现了私人经营的新式果园。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黄家沟宋耀东由烟台等地购进果苗，在村前建5亩果园，从此威海境内出现了果业专业生产。1911年后，威海的孙家疃、槐云、成礼等村部分农户相继建立果园。据《福山县志》记载，原来苹果、海棠果等果树，“植仅庭院，近数十年来，以此为业者甚多，每年出口数十万”；烟台的葡萄酒厂还购买土地为葡萄园，保证生产有充足的原料。20世纪30年代黄县每年有1.2万担梨销往大连³。果品也成为集市上重要商品，在牟平莱山集“除普通货物交易外，土产果品皆出境”，陈家初集“果品尤为出口大宗”⁴，运往烟台，转输江浙闽广等处。

晚清登州府的蔬菜种植呈现出相对集中和专业化趋势。由于城镇人口聚集，增加了蔬菜的需求量，在较繁荣的城镇周围的农村出现了一些蔬菜园地。另外运输条件的改善也为地方特产扩大了市场，为农民增加收入提供来源。“臧家疃产者皮青裹瓜红味甘，经春不变尤为佳品”⁵。有专以卖菜为生的小贩，如黄县王余厚，卖菜于市以为生计⁶。州县城、城内或关厢多设有专门的菜市。黄县“市蔬果瓜常在东街”。乡村集市贸易亦多蔬菜上市⁷。

经济作物专业化产区的出现也带动了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经济作物专业产区农民为追求较高效益，放弃了粮食作物的种植，其日常所需口粮则要依靠外县甚至外省的供应。海阳县花生种植面积近30万亩，产值远远超过小麦，本县“所产食粮每不敷用，历年均仰给于东北及邻县之输入”⁸。近代面粉厂、酿酒厂的兴起，也促使更多的小麦等作为工业原料进入流通市场。登州府丘陵山地较多，耕地资源欠佳，是山东最主要的缺粮区，如登州府治蓬莱“合境地少土薄，丰年且不敷所用，一遇凶歉愈不能不仰食奉省”；招远县土地瘠薄，“除完官税之外，大率不足糊口”；黄县“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⁹。所以粮食成为各集市的重要商品。除小麦外，“胶东各县，则玉蜀黍消用最广，俗名包米，乡间一日三餐，包米实占其二。当地产量虽较其他各部为丰，然以需要太巨，仍嫌不足，每年由东三省输入者甚多。本区域内出产玉蜀黍，以牟平、文登二县最多”¹⁰。文登县“人民食粮以苞谷为主要；有耕地5亩以上之农民（无论自耕农半自耕农与佃农），往往能种1亩半以上之花生，2亩以上之苞米，余下少数地亩，则分种白薯及其他作物”¹¹。在牟平城里“丁字街以北设粮市”，各乡村集市，“交易以粟布为大宗”，在午极集“粮市最大，贩运出境”，南黄集“粮市上除麦豆等常品外，穆子甘薯颇多”¹²。

登州府，北环渤海，南滨黄海，沿海渔场港湾众多，近海渔业是重要的财源之一。

¹ 刘应忠：《荣成纪略》，荣成署内刊本，1907年。

² 梁秉锟等修纂：《莱阳县志》卷二，实业，物产，1935年刊。

³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5编，（戊），第350页。

⁴ 宋宪章等修纂：《牟平县志》卷五，政治志，商业，1936年刊。

⁵ 梁秉锟等修纂：《莱阳县志》卷二，实业，物产，1935年刊。

⁶ 尹继美等修纂：《黄县志》卷八，人物，1871年刊。

⁷ 尹继美等修纂：《黄县志》卷三，食货志，1871年刊。

⁸ 胶济铁路局管委会辑：《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分编第1册，海阳，1933年，第4页。

⁹ 王文焘等修纂：《重修蓬莱县志》卷五，食货志，1839年刊；张作砺等修纂：《招远县志》卷四，风俗，1600年刊；尹继美等修纂：《黄县志》卷三，食货志，1871年刊。

¹⁰ 胶济铁路局管委会辑：《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总编，“农业”，1933年，第14页。

¹¹ 隋德民：《山东文登县农村市场概况调查》，载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上海书店，1990年，第361页。

¹² 宋宪章等修纂：《牟平县志》卷五，政治志，商业，1936年刊。

府属十州县除栖霞一县之外九个临海,“沿海居民多以捕鱼为业”¹。如蓬莱县“沿海斥卤,耕租不宜,全赖终年捕鱼养生”²;招远县“西北鄙负海者四十余里,自开凌以后炊烟渔火岸岛相望,盖鱼船为室而口代耕者终岁为然也”³;海阳有沿海居民数万户,“全赖终生捕鱼养鱼”;文登沿海诸岛,“春夏之交,渔者云集”⁴。莱阳县“四民之外渔为最,渔于河者春冬用平网、流网、袖网、旋网,夏秋用钩之;渔于海者或以船以筏,用流网、拔网、重网,其河口海口各有口口,不相搀越,若有田畔”⁵。威海濒临黄海北部的烟威渔场,渔业资源相当丰富。威海被称为“天风不犯,冬不结冰”的天然良港。1887年(光绪十三年)后,在港湾内先后建7个渔商兼用码头,渔船多来此卸鱼和避风。除就地直接出售外,登州海产有很大一部分是经加工腌制后外销的。如合河罗鱼“味美而多刺,腌作口可远贾”;鲅鱼“在海鱼中为上品,腌作口亦佳,鲅鱼子可远贾”;红娘鱼“大头细身赤色,晒米最佳”;白虾,煮熟“晾干去皮便为海米,鬻之远方,不胫而走”⁶。沿海州县每年用于腌鱼的食盐为数甚巨,《登州府志》记载,“沿海居民多以捕鱼为业,每逢春夏捕鱼之际,所需盐斤动以亿万”。海产品主要销往江南。荣成县“田豆、海鱼售之南舟”⁷;文登县威海口输出货品“以鱼利为一大宗”,上海沙船“每船运万斤以上”⁸。随着渔业的蓬勃发展,沿海许多港湾形成众多的海产品集市。牟平城“南门里设鱼市”,乡间午台集,“地滨海岸,海鲜随时上市”⁹。1906年原礼部左侍郎王锡藩在烟台创办山东渔业公司,资本4万两(内官股1万两,商股3万两)。

晚清登州府地区农副业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口岸贸易的促进,使大量的农副产品投入市场,加深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市场购运的主体是外国产业资本和华商行栈资本,工商资本在城乡市场活动范围的扩大,促使农产品的贸易方式发生显著变化。在商人资本编织的购销网下,各种农户、渔户不再只是单纯依赖集市出售手中的农副产品,而是以更加直接的形式将其卖给粮行(“果米庄”)、药行、鱼行等。农户与产业资本以及专业市场的联系益加直接,而传统定期集市的作用则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流通结构与交易方式的变化,意味着农家经济已被纳入近代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以小商品生产为特征的小农经济,随着产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的不断渗透,也同时失掉了自身的“独立性”,生产和销售愈来愈受制于商业资本的势力,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左右。农户种植美烟和美种大花生,主要是为了出卖,而不是为了自己消费,因此生产与销售均要受制于国内外市场的需求。由于产业资本和行栈资本通过占据市场,操纵市场价格,已基本控制了农产品的市场交易与流通,引种农户的命运便自然与国内外工商资本的购销进止息息相关。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引种农户便会首当其冲,成为危机的牺牲品。

晚清登州府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农副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带来了活力和生机。列宁说:“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增长首先表现在自然农业向商业性农业的过渡上”¹⁰。

2、农业生产性质的变迁

¹ 贾瑚等修纂:《增修登州府志》卷二一,盐法,1881年刊。

² 郑锡鸿等修纂:《蓬莱县续志》卷五,食货志,1882年刊。

³ 陈国器等修纂:《招远县志》卷一,物产,1846年刊。

⁴ 李尔梅等修纂:《海阳县志》,卷二,盐法,1880年刊;郑锡鸿等修纂:《蓬莱县续志》,卷五,食货志,1882年刊;李祖年等修纂:《文登县志》,卷一,山川,1922年刊。

⁵ 万邦雄等修纂:《莱阳县志》卷三,民业,1678年刊。

⁶ 张作砺等修纂:《招远县志》卷五,物产,1600年刊。

⁷ 李天陟等修纂:《荣成县志》卷一,海运,1840年刊。

⁸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7页。

⁹ 宋宪章等修纂:《牟平县志》卷五,政治志,商业,1936年刊。

¹⁰ 《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页。

烟台开埠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加速了封建经济的解体，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某些变化。尤其是国内市场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作物种植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改变了自然经济状态下农村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农民加速分化，从而使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增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¹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领域的出现，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一批直接生产者基本上与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相分离，而成为没有人身束缚的自由劳动力出卖者（长工），或成为尚未完全与土地相分离的农村半无产者（短工）。另一方面一批拥有土地和农具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借助于货币，用雇工经营的办法以达到剥削直接生产者——长工和短工的剩余价值，而成为经营地主。经营地主所支付的货币，已经初步具有了资本的职能。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内市场构成的基础，使小耕作者之分化为农业企业者与工人的过程。”²

光绪时期，登州府农民分化日趋显著，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了依靠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计的雇农和租种土地的佃农，农业生产领域使用雇工的情况较为普遍。“农无田者，为人佣作曰长工，农日占佣者曰忙工，田多人少请人助己曰伴工”。随着农业雇佣关系的普遍发展，形成了一定区域性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在莱阳，“半自耕农与雇农居十之二三，……雇农者，雇约率以一年为期，雇资每年自三四十元至七八十元不等”³。这反映了劳动力的商品货币化有了发展。

表 2-1 晚清登州府雇工工资折实表⁴

地名	大伙计		女工		短工		备注 (当时当地 小麦价格： 文/斤)
	年薪 (千文)	折小麦 (市斤)	年薪 (千文)	折小麦 (市斤)	日工资 (文)	折小麦 (市斤)	
福山东关村	20	833	10	416	300	12.5	24
栖霞马陵塚	15	833			200	11	18
招远后乔村	24	1500	6	375	250	15.6	16
莱阳岭南村	30	789			150	4	38

注：长工均由雇主管饭，本表工资系货币部分。

光绪年间，登州出现了一批经营地主和富农。据调查，在招远后乔村，光绪末年，全村总户数为 40 户，其中雇有长工一至三人的富农有 3 户，雇有长工四至八人的经营地主有 3 户；雇有长工 29 人以上的经营地主有 1 户；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农有二户。此外在蓬莱、莱阳、福山、栖霞等县调查村中也有类似现象⁵。经营地主已初步含有农村资产者的社会成份，这主要表现在：经营地主在农业生产中不是采用租佃制，而是采用雇工制，直接生产者不是佃农而是货币雇佣而来的长工或短工，所使用的工具有完全或绝大部分是经营地主设置的，属经营地主所有；经营地主多半兼营手工业、商业、高利贷，经营地主手中一般都握有较多的货币。晚清登州府地区经营地主通常开设的商店有杂货铺、酒店和布铺等，在手工业方面通常是酒坊、油坊、粉坊和机坊。比如福山县东

¹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 年，第 620 页。

²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4 年，第 40 页。

³ 梁秉锷等修纂：《莱阳县志》卷五，农业，1935 年刊。

⁴ 罗仑、景苏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122、124 页。

⁵ 罗仑、景苏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100 页。

关村大成堂（光绪 24 年），除雇工经营七百亩土地外，还开设了杂货铺、钱店、油坊和一座缫丝坊，同时在大和埠村一带从事高利贷活动。他们成为拥有货币的富裕阶层，这样才可能用货币购买劳动力以达到剥削剩余劳动价值的农村资产者；经营地主的生产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为了生产数额较多的商品谷物¹。

表 2-2 晚清登州府经营地主经济风貌一览表²

县村名	地主姓名	起家原因	占有土地面积 (市亩)	雇工经营面积 (市亩)	租佃经营面积(市亩)	商业手工业设置情况
蓬莱上口高家	高大黄	种地	1000	500	500	
蓬莱北林院	李鹏	经商	180	120	60	制烧锅、开杂货铺
蓬莱安香于家	邹焕章	经商	720	100	620	开油坊、杂货铺、机坊
福山东关村	大成	经商	3000	700	2300	开油坊、杂货铺、缫丝坊
栖霞马陵塚	李绪田	经商	3000	80	2920	
栖霞中桥村	宫明诚	种地	450	70	380	在北京开饭店
招远后乔村	孙云章	作官	3000	200	2800	有两座油坊
招远后乔村	孙云书	作官	1000	100	900	
莱阳前埠后村	隋汉东	种地	600	300	300	设有酒坊、油坊

此外，经营地主雇用的直接生产者，即被经营地主奴役的长工已经基本上含有自由无产者的身份。所谓的自由，即长工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卖劳动力；长工已基本上与土地分离。长工就其本人社会身份而言，仍然属于被排挤出土地的自由劳动者。马克思在分析货币所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前提时，明确指出：“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遇到自由的劳动者。这所谓自由，是二重意义上的自由。它当作自由的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商品来处理。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东西，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步。”³

不可否认，在晚清登州府地区，农业中的封建生产关系仍占主导地位，封建租佃制是主要经济生产方式。农业经济中虽然蕴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但这种因素是不稳定的，仍残留着自然经济的成份，并不断遭到封建势力的阻挠、抑制、影响，发展是缓慢的。但是在日趋没落的封建母体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体，标示了农业经济关系中的新变化。

¹ 罗仑、景苏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41页。

² 罗仑、景苏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附表。

³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178-179页。

三、 晚清登州府工业经济的变迁

现代化从狭义上来说,就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其实质就是工业化。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晚清登州府的工业经济借助于口岸贸易的初始推动而艰难起步;同时,由于近代工业化不可能脱离传统的产业结构,与口岸贸易密切联系的手工业已经发生嬗变和改组,因而成为晚清登州府工业经济变迁的一项重要内容。

1、 传统手工业的嬗变

烟台开埠以后,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品尤其是机制产品如棉纱、棉布、五金、火柴、煤油、染料等涌入登州府地区。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外国商品对登州府传统手工业经济的冲击更加猛烈。一些手工业行业在外国商品的竞争下,面临着滞销、衰落、歇业的命运。

手工棉纺织业是登州府城乡最主要的手工业行业,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僻处山东半岛最东端的登州府,虽地不宜棉,棉花多需由江南输入,家庭棉纺织业却相当普遍,山东黄县,“地狭人稠,有田者不数家,家不数亩,养生者唯贸易为计,而妇女尤勤纺织”¹。栖霞县,“田多砂石,耕获完官不足糊口……无论绅士及农家男妇多纺织”²。除满足自用外,也有部分棉布外销。据府志载,农民“纺绩花布以自衣被,穷乡山陬,无间农妇为之,……有余布亦兼鬻之乡市”³。莱阳县,“无论男妇皆纺花织布以自衣,而余布鬻之乡城市上”⁴。但是开埠通商后,大量洋纱、洋布输入登州府地区,严重冲击了传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之趋于衰落。在莱阳农家妇女,“往岁大半纺纱”,但在洋纱冲击下,到民国初年,纺纱业已“久经停歇”⁵。在宁海,织土布“原为家庭一种副业”,“海禁开后,洋布渐入,喧宾夺主,无法自存”,到19世纪末,“此种旧式之纺织,遂至逐渐消灭”;大约同期,莱阳、黄县的手工织布业也大都“消歇”⁶。福山因烟台口岸地处境内,所受洋货冲击尤为严重,该县“自洋线洋布入口”,手工棉纺织业遂“大衰”⁷。

外国商品在占夺棉纺织品市场的同时,也占夺着其他日用手工业品的市场。如外国钢铁进口后,因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工匠弃土铁而用洋铁。烟台港开放后,因陆路运输的需要,锻铁业盛极一时,铁匠最多时达5,000余人,所用原料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进口废铁⁸。土铁在登州府地区几乎已被洋铁完全挤出了市场。烟台手工蜡烛制造业,在清代中叶曾十分兴盛,“自煤油、洋烛入口,而此业益衰”。登州府地区原先有许多制作火镰的手工作坊,“自洋火盛行,人乐其便,外货畅销,日甚一日”,火镰作坊和火镰遂为火柴所取代⁹。

¹ 李蕃等修纂:《黄县志》序,1673年刊。

² 永泰等修纂:《续登州府志》卷六,风俗,1742年刊。

³ 施闰章等修纂:《登州府志》卷八,物产,1694年刊。

⁴ 万邦雄等修纂:《莱阳县志》卷三,食货志,民业,1678年刊。

⁵ 梁秉辑等修纂:《莱阳县志》卷二,实业志,工业,1935年刊。

⁶ 宋宪章等修纂:《牟平县志》卷五,政治志,实业,1936年刊。

⁷ 于宗潼等修纂:《福山县志稿》卷一,物产,1931年刊。

⁸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rade, Industries, etc., 1882-1891, Chfoo, p.55.

⁹ 于宗潼等修纂:《福山县志稿》卷一,物产,1931年刊。

面向国内外市场的口岸贸易对于广大城乡手工业者来说，这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洋货的倾销冲击了登州府地区原来的相关手工业，使之趋于衰落；另一方面，许多手工业适应了对外贸易的需要，实现了自身的转型与发展。

在登州府个别地区市场经济日趋活跃的形势下，土布仍顽强地抵抗着洋布的侵蚀，继续发展，“本县自造衣料，棉织品有土布，外购棉花，自行纺织，近多改用洋线”¹。许多农民停止纺纱，改用廉价的洋纱织布。土布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土布不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通过行商、布店，远销到外地市场。因此传统耕、纺、织三者结合的经济体系开始分离，棉纺织业的自给性发生变化。棉纱与棉布生产，从原料购取到成品销售越来越依赖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市场制约和商人资本控制。棉纺织业的商品化生产进一步发展。

由于传统的手工缫丝业与丝织业因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且无洋货倾销而带来的竞争压力，反而因国际市场的需求刺激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得以重兴。登州府手工缫丝业和丝织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两汉起到清代，一直相沿不衰。登州府的宁海、文登、栖霞、海阳、莱阳等县是柞蚕丝的主要产地。使用柞蚕丝织成的绸，称为茧绸。晚清时期，宁海、栖霞等地已逐渐发展为织造茧绸的中心。柞蚕丝和茧绸就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和重要输出商品。

19世纪60年代，随着烟台港的对外开放，柞蚕丝和茧绸开始输出国外。1866年柞蚕丝的出口量仅83担，茧绸出口量仅648担。1877年德国商人在烟台设立了“缫丝局”，使用机器进行缫丝，产品全部用于出口，从而扩大了烟台柞蚕丝的输出量。另外，外国资本还在烟台设立洋行，通过买办深入内地，组织手工丝产品的购集和输出。到19世纪80至90年代，丝和丝织品成为烟台最重要的输出品。1882年烟台出口的各类丝和丝织品已达8,085担。丝和丝制品的大量出口直接刺激了缫丝业和织绸业的发展，促使缫丝业与织绸业按国外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发展起来，并且使这两个行业具备了愈来愈突出的近代商品生产特征。

从19世纪80年代起，登州府的柞丝缫丝业和茧绸织绸业获得了较快发展，缫丝与织绸已成为城乡十分普遍的手工业行业。宁海、海阳、莱阳等地缫丝织绸之家处处可见。栖霞“农作外间治茧丝，织本色绢，又有茧绸”²；文登“邑中诸山……皆产茧，每年秋季茧熟，西商挟重资赁屋缫丝，席卷归去。所织细致而光润，名曰茧缎，南走姑苏，北达燕辽，通都大邑，四出贩卖”³。莱阳“纺工纺之织工织之质坚且良，每年运往烟台转输外洋，获利约十余万金”⁴。在晚清登州府缫丝业朝着商品化生产方向转变的过程中，烟台逐渐发展成为缫丝业的生产贸易中心，宁海、栖霞则发展成为茧绸的织造中心。同时，缫丝业内部发生改组，由家庭手工业向手工工场过渡。烟台及其附近的缫丝业以前一直采用旧法，以家庭副业劳动形式为主，由缫丝者“在自宅设备数台或数十台之缫丝器，即从事制造”⁵。19世纪末，烟台开始零星出现拥有缫车上百架，使用数百雇佣工人缫丝的手工缫丝工场。到1903年烟台已有手工缫丝工场（纺丝局）16家，机器缫丝工厂3家，计有工人5,500余人。按每个工人每年缫丝150斤计，全年约生产丝8,250担⁶。1906年，手工缫丝工场发展到20家，共有缫丝工8,500余人，年出丝约10,546担，其中径运出口2,258担，其余或用于织绸，或经上海转口输出⁷。1909年，烟台各“纺丝局

¹ 宋宪章等修纂：《牟平县志》卷三，地理志，生活，1936年刊。

² 黄丽中等修纂：《栖霞县续志》卷一，附民业，1879年刊。

³ 李祖年等修纂：光绪《文登县志》卷一三，物产，1922年刊。

⁴ 梁秉辑等修纂：《莱阳县志》，卷二，实业，物产，1935年刊。

⁵ 万葆元：《山东之柞蚕》，农商部公报编辑处：《农商公报》第4卷第3册第39期，1917年10月。

⁶ 上海通商海关造册处译：《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1903年，烟台口，第13页。

⁷ 上海通商海关造册处译：《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1906年，烟台口，第10页。

因获利颇丰”，将“纺丝器大为增加”。当时烟台共计有手工纺丝局 38 家，机器纺丝局 3 家，缫工 17,000 余人。各工场资本总额达 500 万两。义丰恒、成生利、正祥公三家缫丝工场的缫车数均在 700 台以上¹。1911 年，烟台缫丝工场发展到 40 家，缫丝工人约 14,000 余人，年产柞丝 14,000 担²。1912 烟台手工缫丝工场达 44 家，缫车总数达 14,629 台，年产量约为 15,700 担³。缫丝工场增加的同时，工场的规模也愈来愈大，44 家缫丝工场平均每家有缫车 355 台，其中拥有缫车 500-600 台的工场为 13 家⁴。这一时期，文登、宁海、栖霞、海阳、莱阳等地也出现了一些手工缫丝工场，这些工场多半是用当地蚕茧缫制大框丝，供当地农户织绸。

登州府地区缫丝业生产的发展，加深了对国内外市场的依赖。在原料供应上，烟台每年要从东北输入大批蚕茧，以供缫丝业之需。1908-1911 年烟台蚕茧输入量平均每年约 20 万担。在流通流域，生产的生丝，除部分供织绸外，“全赖销售于外洋”，尤其是烟台缫丝工场“所纺之丝，均为上海洋商定作之货”⁵。1911 年烟台输出的柞蚕丝达 12,193 担，生丝出口后大部运往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生丝出口的发展，改变了缫丝业原先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同时也加深了缫丝业对市场，尤其是国外市场的依赖。

在生丝大量出口的同时，茧绸也开始大批销往欧美国家。登州府的手工茧绸业，集中于烟台附近的栖霞、宁海等地。晚清出现了一批手工纺丝局。据 19 世纪 80 年代初的调查，烟台洋行有织机 200 架，宁海有 100 架，栖霞有 150 架⁶。1911 年宁海的手工工场有织机 174 台，栖霞有 292 台。晚清，宁海、栖霞等地的织绸业已逐渐由家庭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织绸工场一般雇佣织工和辅助工十儿人至数十人，拥有织机 5-10 架，较大的工厂有织机数十架。按工艺需要，织绸分成若干道工序，各工序之间分工细致，首尾相接。当时的手工工场已能织造数十种规格花色的茧绸。

除手工工场外，登州府地区的农民还有农闲织绸的习惯，其产量约计 10 万匹⁷。晚清茧绸销售市场基本以国外市场为主，“订货者以外商为多”，大部分通过烟台运销于英国、法国、印度以及香港和南洋群岛。1910 年代，单是每年运往烟台的茧绸，栖霞为 10 万匹，宁海为 5-6 万匹。

榨油业也是登州府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业部门。榨油作坊散布于各县城及乡村。清代咸丰年间，登州府地区榨油业生产的豆油、豆饼即已远销至南方沿海诸省。豆饼主要由汕头帮商人经营，运往华南地区做甘蔗田肥料。烟台开埠后，豆饼出口规模迅速增大。1863 年单是后 9 个月的出口量即达 59 万余担，居各类出口土货首位。到 1875 年，烟台豆饼年出口量已超过 100 万担，1901 年达到 156 万担。1906 年豆油输出达 21 万担。在出口增长的带动影响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榨油业中的商品化生产出现了较快的发展。以外销出口为主的榨油业，主要集中于登州沿海地区，其中比较著名的生产地和产品集散地为文登张家埠口、海阳乳山口、荣成石岛和俚岛、黄县龙口等，而烟台则为整个登州府地区的榨油业中心。1899 年烟台已有油坊 40 家，经常使用的油碾共 112 盘。宣统年间，烟台油坊增至 56 家，拥有油碾 147 盘，每盘油碾每日榨油 10 石左右。油坊规模较大的为裕庆升油坊，拥有油碾 10 盘，其次为裕增号、常恒升两家油坊，各安设油碾

¹ 上海通商海关造册处译：《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1909 年，烟台口，第 23 页。

²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rade, Industries, etc., 1902-1911, Vol. I, Chefoo, P229.

³ [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 4 卷，《山东省》，1915 年，第 794-814 页，转引自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变迁》，中华书局，2000 年，第 404 页。

⁴ 万葆元：《山东之柞蚕》，农商部公报编辑处：《农商公报》第 4 卷第 3 册第 39 期，1917 年 10 月。

⁵ 上海通商海关造册处译：《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1897 年，烟台口，第 9 页。

⁶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2 卷，中华书局，1962 年，第 95-96 页。

⁷ 安源美佐雄：《支那の工業と原料》第 1 卷下册，1919 年，第 91 页，转引自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变迁》，中华书局，2000 年，第 416 页。

6 盘,此外还有六家油房拥有油碾在 4 盘以上¹。光绪末年,登州(蓬莱)有油坊 30 户。

登州府地区榨油业所需大豆原料,当地根本无法满足供应,大部分要从辽东半岛等地输入。1900 年烟台从东北地区输入大豆 86 万余担,1909 年输入量增至 230 万担。从生产和流通来看,晚清登州府地区的榨油业已具备了明显的商品化生产性质,原料和制成品完全依赖于市场,生产和流通规模也受市场制约。

粉丝加工业也是具有农村副业性质的家庭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中叶,每年有大宗粉丝由民船运往南方销售。烟台开埠后,粉丝开始输往香港、美国及东南亚地区,成为一种重要的出口商品。晚清,烟台出口粉丝集中产于登州府属各县,年总产量达 21 万包(1 包约为 150 斤),其中宁海年产 10 万包、福山年产 5 万包、黄县年产 3 万包、招远年产 2 万包,蓬莱、莱阳年产各 5,000 包。1894 年宁波人在龙口开设粉庄,从此龙口粉丝销路日畅。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粉丝加工业在登州府已由单纯的农家副业过渡为商品化生产。“此项农村副业,几遍全县,乡传既久,成绩擅长,产量尤多,为土产出口大宗,乡村之收益,其价格不在稼穡下也”²。粉丝生产所需豆类原料除少部分靠当地供应外,大部分系由大连、营口、锦州、天津、羊角沟、利津等地购入。加工粉丝的粉坊具有手工作坊性质,由农村富有者经营。通常一家粉坊资本(不含流动资金)约需制钱 100 余吊,雇佣帮工十人左右。粉坊加工的粉丝由收粉庄收买,经加工包装后输往南方和国外。民国初年,烟台收粉庄共有 30 家,龙口有收粉庄 16 家,分别由烟台帮、潮帮、福建帮商人经营³。

晚清登州府传统的手工业部门,在烟台开埠后,随口岸贸易的发展,有些趋于没落,而有些出现转型与更大规模的发展。榨油、粉丝等传统手工业产品市场由省内和南方沿海地区市场,随着出口量的增加,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产品,其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大大提高,生产组织形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生产过程和产品销售为行栈资本所控制,产品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也愈益加深。

2、新兴手工业的崛起

一些新兴手工业部门如草辫业、花边业、发网业适应市场需求和出口增加的需要而迅速崛起,从无到有,从而改变了登州手工业的传统格局,给经济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使手工业行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登州草辫业作为一种新兴的手工行业,是在烟台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从 1862 年开始在烟台出现,到 70 年代逐渐发展到登州府的广大乡村,成为重要出产。与此同时,草辫因价廉物美,“洋行收购日增”,以致输出货值年有增加,刺激着该业生产运销规模不断扩大⁴。到了清末,登州四乡农民“几无户不兼操斯业”⁵。草编业成为当地人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草辫生产,普遍采用的是家庭劳动的形式。“草辫之原料由农民种植而来,其编织之手工,亦即由其家人妇孺自为经理”,“秃麦亦曰火麦,其秸可为扇,为草帽辫”⁶。当时曾有人这样描述草辫生产情形:“当夫夏日炎炎,农

¹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三联书店,1957 年,第 412 页。

² 宋宪章等修纂:《牟平县志》卷五,政治志,实业,工业,1936 年刊。

³ [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 4 卷,《山东省》,1917 年,第 744-747 页,转引自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变迁》,中华书局,2000 年,第 340 页。

⁴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1877, Chefoo, p. 254.

⁵ 农商部公报编辑处:《农商公报》第 4 卷第 1 册,第 35 期,1917 年 6 月,第 25 页。

⁶ 梁秉锟等修纂:《莱阳县志》,卷二,实业,物产,1935 年刊。

人从事南亩之时，其家人则朝夕勤劬，以为帽辫之编织。”¹从原料来源到生产制作，草帽辫生产基本保留着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形式。但到了20世纪初，随着民间资本兴起举办实业的热潮，在草辫主产区部分绅商投资兴办起草辫加工工场。例如1907年黄县绅商投资5万两，创办草辫公司。这些手工工场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单纯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形式，将相当一批专业编织工人集中在工场内，实行统一管理，工人按照公司的统一要求从事工作，各道工序采取合理分工，从而使生产效益大大超过了分散的家庭生产。

登州府的花边业，发轫于烟台，起初仅为当地妇女的一种家庭工作。1894年，美国基督教差会牧师乔治·赫士夫妇在烟台教习花边制作。其后，英国内地会传教士马茂兰夫妇又在当地妇女中加以倡导推广。大约在此前后，花边制作技术在宁海“由地方教民得基督教会之传习，逐渐散布于各乡村”²。清光绪、宣统年间，花边业主要集中于烟台、栖霞、宁海、海阳、招远等地。1904年栖霞约有花边业女工200余人，到1910年左右，烟台附近地方已有数以千计的妇女从事花边生产，“仿照比、法两国花样，加工织制，乃与欧洲花边开始竞争”³。1904年，烟台花边曾参加美国圣路易赛会，获得金质奖牌，1907年又在澳大利亚妇女工艺赛会上获得优等凭照。自此烟台花边声誉鹊起，开始大批输往英国、美国和澳洲。1911年烟台花边出口约6万海关两。1912年增至12万海关两，而用邮包邮往国外的花边数额则远远超过此数⁴。

起初，洋行通过预定期货或垫款包买，控制了花边的出口业务。民国初年仅烟台一地从事花边业的外国洋行就有6家。后来，部分华商投资设立花边庄。黄县“企业者设庄至十余处，以午塔村、北宿、曲家村为最盛，咸用技师集合女工教导之，授徒遍于各乡……花边庄发出线料，织成则收购之”⁵。将原料分发给家庭女工，组织她们按预定规格编织，然后将散于各家各户的织成品收集起来，配以各种花样，再转售给洋行，或自行输往国外。

随着花边市场需求量的增长，生产规模的扩大，出口数量的增加，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花边手工工场。1902年烟台出现了花边工场，到清末民初发展到数十家。宁海同类工场也是星罗棋布，从事花边生产的女工比从事纺织业的还要多，“中外互市，工业上所取得欧美之利益者，舍此几无他物”⁶。海阳县商人1912年2月创设勤勤花边工场，到10月已有三个分场产生⁷。但这些花边手工工场主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包买商的性质，到了民国以后，才出现集中化程度较高的手工工场。

发网业的肇兴几乎与花边同时，1894年开始在烟台附近兴起。当时欧美国家的妇女时兴用发网包套头发，中国发网原料丰富，劳动力低廉，具备发展发网业的有利条件。晚清登州府的发网业，到宣统年间，以烟台为中心，在牟平、文登、威海、福山、栖霞等城乡广为发展，成为该地区一项以妇女劳动为主的重要家庭手工业⁸。登州“四乡农民，几无户不兼操斯业”，乡间织花边者十家中便有五六家⁹。招远一县即有五六万人业此¹⁰，黄县亦有数万人。发网生产和销售完全依赖于国外市场，伦敦、曼彻斯特、纽约、巴黎

¹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404页。

² 宋宪章等修纂：《牟平县志》，卷五，政治志，实业，工业，1936年刊。

³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409页；经济讨论处：《中外经济周刊》第2号，1923年，第11页。

⁴ 交通部烟台港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95页。

⁵ 张殿邦纂修：《龙口志》，卷五，工业，1936年刊。

⁶ 宋宪章等修纂：《牟平县志》卷五，政治志，实业，工业，1936年刊。

⁷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410页。

⁸ [日]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山东之物产》第5编，1921年，第49页，转引自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334页。

⁹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403-404页。

¹⁰ 千家驹：《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上海书店，1990年，第554页。

是发网的主要出口地。国外市场的大量需求,刺激着发网加工和出口不断增长。1909年,英美商人开始从烟台等地直接购入发网,发运国外,1913年烟台发网的出口额已达10万两。输出商资本实力的增长与出口规模的扩大同步。烟台从事发网出口的输出商,最初只有华商发业公司和英商仁德洋行等二三家,到1916年增加至15家。

与传统手工业不同,发网加工业并非自发进行,而是由发网庄来组织。发网庄介于输出商与加工农户之间,在有担保人担保的条件下,输出商将原料贷给发网庄,与发网庄订立合同,约定交货规格、数量、期限和收购价格。发网庄订立合同后,便分别将原料转发给编织农户,由农户按要求加工,按件计酬。有时发网庄也以自有资本购进原料,分发给农户,收集回发网后,随行就市,转卖给输出商¹。

草帽辫、花边和发网业,是在传统手工业遭受打击后,为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手工业,因而有着与传统手工业不同的特点。晚清登州府地区,草帽辫、花边和发网业生产,不是作为耕织一体的小农经济的必然组成部分而出现的,其兴衰起伏与农村经济关系不很密切,与国内市场需求几乎不发生联系,绝大部分是为了国外市场的消费需要,产品购销要受到国外市场需求变化消长的制约。在生产关系上,这类手工生产一开始就带有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性质,手工业者在很大程度上,受行栈商——辫庄、花边庄、发网庄的剥削和控制。这种剥削和控制表现在资金、原料、制作方法、加工规格和成品价格等方面。城乡手工业者为维持生活,不得不以廉价劳动力为行栈商加工产品,成为分散在自己家中为商业资本工作的雇佣劳动者。

3、 机器工矿业的出现

机器生产相对于传统经济中的手工劳动而言,不仅以其先进设备、高级技术、空前效率而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新的生产方式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结构,在生产管理、产业组合、资本构成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新奇的变革。如果说,狭义现代化的实质是工业化,那么工业化的核心基础则是机器生产。

19世纪60年代,外国船只进出烟台港的数目增加很快,每年都在600只以上。适应轮船航运发展的需要,从1866年起,烟台李契曼洋行开办了修船业务,配置机械设备,承修来往烟台的外国船只。

1872年,美国商人在烟台成立一家蛋粉厂,加工出口黄、白蛋粉²。

1890年烟台就成立了一家协成机器厂,资本仅有1,500元。

晚清时期,机器缫丝工厂首先发轫于烟台。1877年,德商宝兴洋行设立了烟台缫丝局(Filanda),这是登州府,乃至山东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也是全国第一家专缫柞丝的近代机器工厂。1895年该厂租给烟台华商顺泰商号经营,改名为华丰缫丝厂,全部使用蒸汽机。当时工厂共有38个蒸茧锅,安装法国制缫丝机550台,雇佣缫丝工550人,剥茧工等杂工47人,日缫丝150斤。5年之后,该厂已有法国式丝车550台,蒸茧锅38台,占地38亩,雇佣职工600多人,每日产丝250斤,已有相当的规模³。此外,1899年,烟台出现了华泰缫丝厂,由兴泰商号投资兴建。资本7万元,占地20亩,32马力蒸汽机1台,法国制生丝纺机8台,煮茧器28个,缫车530台,职工578人,柞蚕丝全部用于

¹ 日本外务省:《在芝罘日本领事馆管内状况》,1921年,第157页。转引自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335页。

² 孙祚民:《山东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08页。

³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icennial Reports on Trade, Industries, etc.*, 1892-1901, Chefoo, p.81.

出口¹。到1903年,烟台已有华丰、华泰、益丰三家机器缫丝厂,每家工厂各有缫车700台左右,其中华泰规模最大,约有工人700余人。机器缫丝厂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缫工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提高了缫丝的质量。

烟台开埠后,外国机制卷烟大量输入口岸城市,制造纸烟遂成为一项获利丰厚的行业。一些民族资本家开始试办新式卷烟厂。1905年,天津官商合办的北洋烟草工厂在烟台设立分厂,使用机器生产纸烟。此后数月之间,烟台相继又有中安、隆盛、仁增盛、恒利四家机器卷烟厂成立。中安公司由同泰和行栈经理唐世鸿创办,资本8万元,设备为美国制卷烟机3台、切烟机2台、吹雾机和干燥机各1台,职工52人,日产卷烟20万支。隆盛公司由商人王廷彬创办,资本银5万两,设备为美国制卷烟机3台、切烟机1台,职工50人,日产卷烟30万支。仁增盛烟草公司由商人孟昭颜创办,资本3万元,使用日本增田式卷烟机和切烟机,职工47人,日产卷烟20万支。恒利公司由商人易怀远创办,资本5万元,使用机器与仁增盛相同,日产卷烟5万支。这四家烟厂成立初期,产销曾一度比较畅旺,产品不仅销于国内各埠,而且还部分出口国外²。1906年,烟台各家烟厂出口卷烟价值银6万两,1907年出口值又增至8.7万两。

在粮油加工行业,民间私人资本也有若干投资尝试。19世纪末,烟台华商设立了一家机器磨面局,这是登州府及山东最早的新式机器磨坊。1911年,烟台又有一家机器碾米厂茂兰福面粉厂成立,年产面粉17,000担。这一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当时该地区每年30万担的需求量³。1908年,烟台油坊从日本进口一批蒸汽榨油机,用以代替传统的手工榨油。到1911年,烟台使用蒸汽榨油机的榨油工场已发展至12家⁴。

酿酒业最突出的就是张裕酿酒公司。1895年由华侨商人张弼士在烟台成立。公司成立后,“所有广购地亩,续购机器,设立工厂,建筑地窑,一切资本”,均由张弼士等人“先行垫用”⁵。从烟台东山、西山购得荒山千余亩,雇工千余人,劈山造田,营建葡萄园。同时,公司购地100亩,建筑厂房和酒窖。生产机器大部购自国外。1908年张裕公司已能生产20余种红、白葡萄酒。1909年公司还成立玻璃料器厂,制造酒瓶和玻璃制品。

1907年登州商人杨滋勋、李文林,召集股本在烟台开设登武公司,制造榨油机、轧棉机等多种机械,产品多为各处工艺局购用⁶。

随着近代城市规模的扩大,工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的发展,民族资本兴办的电业也开始肇兴。1905年,烟台华商孙克选在烟台安设小型发电机组,1913年该商又正式成立生明电灯公司,资本银21万两,向市区供电。

登州府地区也是重要的矿产基地,尤其是金、银等矿产十分丰富。隋唐时期就大规模开采。烟台开埠后,中外资本开始关注登州地区的矿产开采。1868年5月,英国人德勒克、丹麦人甘美伦等,在宁海州林家沟头,雇佣矿工七八人,私自采挖金矿。此后,外国来的采金者日渐增多⁷。1891年,李宗岱与侨商李赞勋创办招远矿务公司,开采招远玲珑山、红石崖等处金矿。招募股金60万两,官款25万两。从1891年到1892年雇佣矿工,开采8口矿井。1897年5月李宗岱之子李家恺重开宁海金矿,1897-1898年盈利金1300余两。1898年英国人在威海卫以西40英里的狼虎山,买民地40余亩,开采金矿。1904年设立威海卫金矿有限公司。

¹ 峰村喜藏:《清国蚕丝业大观》,1902年,第284-286页。转引自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357页。

²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附表。

³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rade, Industries, etc., 1912-1921, Vol. 1, Chefoo, p. 199.

⁴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rade, Industries, etc., 1912-1921, Vol. 1, Chefoo, p. 230.

⁵ 北京商务官报局编:《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第1期,第34-35页。

⁶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东方杂志》第4卷第12期,1908年1月,实业,各省工艺汇志。

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2册,台北,1960年,第863页。

晚清登州府工业经济的现代化，分为两条途径：一是传统手工业受对外贸易的影响，以国内外贸易体系为指归，逐步采用改良机械工具替代旧式工具，以提高生产效率；一是直接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两条途径的同时发展，造成了晚清登州府地区工业经济中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机器生产与手工制造、家庭副业劳动与手工工场混合的特征。相对于传统经济体系而言，工业经济中的新兴产业和新经济成份代表了晚清登州府地区经济的发展方向。

四、 晚清登州府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

晚清登州府口岸贸易的发展，促使大量农副产品和工业产品流入市场成为商品，改变了传统的单一农副产品少量在城镇乡村的流动，商品流通结构也因此发生改变。

口岸贸易使大量洋货流向市场，深入城乡，成为市场的重要商品。新式手工业产品和近代大工业产品也进入城乡市场，商品流通种类和规模都显著增多。同时，口岸贸易促使大量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口岸市场，出口到国外，而且新式手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也迫切需要从乡村各地输入原材料。所以这就造成土洋货、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双向流通新格局。这也就促使商品流通的载体即市镇发生重要变革。

1、 市镇经济的发展

晚清登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与变迁，首先表现在集镇贸易的发展上。基层集镇分布于登州府的广大乡村。集镇贸易是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而形成的初级市场。集镇的一般特点是，市廛有地，交易有期，交换以当地产品为主，须逢场期，始来交易，平时市面冷落，几乎没有外地富商大贾，故有谚曰：“聚者为集，散者为墟”。集镇的分布以方圆十余里为度，保证农民一日步行，可以来回，以便不误农时。集期以五日一次者居多，乡邻集市距离在 15 华里以内者，集期大都相互错开，使得村镇周围 15-20 华里范围内几乎每天都有一集供当地居民交易。

晚清登州府由于口岸贸易的兴起，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民间交易的频繁，使农村集镇贸易呈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集镇数量增加，集市规模扩大和庙会经济急剧发展。

晚清登州府农村集镇的发展，首先体现在集镇数量的增多和分布密度的增高上。晚清登州府集镇数量已经从乾隆时期的 116 个，增加到清末的 196 个，增长了近一倍。

表 4-1 晚清登州府集镇数量变动表

县名	康熙 ¹	乾隆 ²	光绪 ³
蓬莱县	5 (5)	4 (5)	14 (4)
黄县	4 (4)	6 (4)	7 (5)
福山县	3 (4)	5 (1)	7 (3)
栖霞县	8 (2)	8 (3)	15 (4)
招远县	6 (3)	4 (3)	9 (6)
莱阳县	22 (5)	20 (4)	37 (5)
宁海州	20 (6)	12	19 (6)
文登县	19 (5)	26	21 (5)
荣成县		2 (1)	8 (1)
海阳县		17 (1)	20
合计	87 (31)	94 (22)	157 (39)

注：() 内为在城集。

¹ 任瑋等修纂：《登州府志》卷六，坊市，1662 年刊。

² 永泰等修纂：《续登州府志》卷四，坊市，1742 年刊。

³ 贾瑚登修纂：《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七，食货，坊市，1881 年刊。

其次是集镇的规模明显扩大，贸易水平显著提高，尤其是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产地市场，土产的交易规模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在蚕丝出产区宁海州，“秋茧上市，为各乡集最盛时期，在崖子，“某集期，上市茧数，达十余万千之多（茧以千数为单位），价值四十余万元”，而且“此巨额之茧，未必概为本区所产，而本区所产，亦未必同日到市”¹。

此外，集镇商业与摊贩贸易相结合，在县城市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牟平城关集，以农历五、十日为大集，三、八日为小集，逢大集“凡当地产品，如食粮、柴薪、果品、牲畜、鸡鸭、海鲜、杂器……等，虽在数十里外，莫不麇集，而虾皮（小虾米）、黄烟及日常用品之小贩，且有来自外县者，聚会恒达数万人。货物陈列，各有定所。”²在荣成县崖头，许多商铺、行栈、饭店集中在一条南北大街上，在一条东西街上，因为多出售海货，被称为海腥街。

晚清登州府的集镇市场交易主体，除产品生产者本人外，出现了一些有着特殊身份的掮客、商贩、行栈。这些交易者的买卖服从于更高层次市场商品流通的需要，通过这些交易者的经营活动，带动激活了集镇市场的土产贸易，为内地与烟台口岸之间土洋货的双向流通提供了条件，从而使初级市场的土洋货购销得以实现。烟台口岸市场的洋商、买办、栈商的购销经营已经延伸到乡村集镇，使集镇产地市场的商品流通已经与烟台口岸市场联系在一起。

而且，集镇商品交易的种类不断增加。一方面，与城市消费和进出口有关的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成为交易的重要项目；另一方面，烟台等口岸市场进口的商品和城市近代工业生产的机制品，也以不断增长的数量进入农村集镇市场。在牟平县（宁海州）：³

解甲庄集，地近烟台，负贩者货品多来自烟；交易以粟布为大宗，其余日常食品用品俱备。

莱山集，市面繁盛，廛肆林立，牟福两界间，此为最大商场；除普通货物交易外，土产粉丝果品山茧皆出境。

午台集，地滨海岸，海鲜随时上市。附近陈家初集，果品尤为出口大宗。

龙泉汤集，介牟文之交，为东西往来要冲，城关及邻县，多运货到此销售；又崑崙山后远近山村出而交易者，必以此为中心点；输入品多洋货，输出品除柴薪药材外，以山茧为大宗。

水道集，市面交易，除普通物品外，有土产香稻米及沙金上市。

尺坎集、张家圈集，均僻居崑崙山里，野味柴薪山茧，皆输出品也。

崖子集，实为商务荟萃之冲，往年丝茧盛行，崖子茧市，为全县及邻县之冠，其它市品，亦应有尽有。

午极集，粮市最大，贩运出境。

玉林集，地处平原，道路通达，四方商贾辐辏，为县南境著名市场；土产黄芋桑茧颇多，为输出品。

冯家集，凡崑崙山迤南，黄垒河两岸，远近百数十村，胥交易于此，实为县南第一大市场；市内商号林立，应有尽有，每逢集期，百货云集，山茧桑茧均为输出大宗。

南黄集，地处平原，青威路由此经过，交通四达，为县境东南部最大市场；设有上会一处。

孤山、黄瞳、石头圈三集，则范围较广，市场较完备，粮食上除麦豆等常品外，穆子甘薯颇多，秋期茧市亦盛，鱼市随时皆有。

¹ 宋宪章等修纂：《牟平县志》卷五，政治志，实业，蚕业，1936年。

² 宋宪章等修纂：《牟平县志》卷五，政治志，实业，商业，1936年。

³ 宋宪章等修纂：《牟平县志》卷五，政治志，实业，商业，1936年。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在商品种类增加的同时，集镇已经开始产生分化，形成专业化市场。经营大宗土特产的行业发展成为集镇的主要商业行业，这标志着部分集镇，开始由一个只有狭小销售区的原始市场，逐渐演变成为有着较大销售市场的地域性市场。

还应注意的是，晚清登州府的某些集镇居民经营手工业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一般性集镇，也就是大多数中小集镇所拥有的手工业，与广大乡村手工业大体相似，大都是对农副产品进行粗加工和为满足集镇居民日常生产和生活所需而进行的生产。粮食加工、榨油、纺纱、织布、缫丝、丝织、染色、轧花以及木、瓦、铁铺等差不多都是各镇共见的手工业行业。在海阳县臧家庄集，西直方于光绪 19 年（1893）出资万元，开设油坊。工人 2 人，忙时雇用临时工，年获利 2 千元（银元）¹。

上市人数的增多。在莱阳水沟头集，上市人数达 10 万人之多。此外，在集镇上，饭店、茶馆、旅店、理发、浴室等饮食服务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集镇发展成为附近农村的经济生活中心。

晚清登州府的集镇贸易发展还包括庙会的发展和繁荣。庙会，也是农村集市的一种形式。庙会，亦称货会、山会（山市）、神会（神集）等等，这种贸易形式至少在明代即有。

庙会与集镇同为定期市，但集镇开设是以旬为计，每旬两次或三四次，庙会开设则以年为计，有的一年只开一次，多者亦不过三次。会期有的一两天，有的多达五六天，甚至持续十几天。上市人数少者上万人，多者数万人。庙会开设时间较多地集中在春耕之前，或秋收之后，一般是在农历的三四月和十月，与农作的季节密切相关。

庙会的贸易范围也比集镇大得多，大致可达方圆数百里，三五个县的范围，或者更大些；其商人来自各地，商品品种、数量和交易量都远远超过集市。每逢庙会日，庙会所在地百姓云集，人头攒动，除隆重的敬神活动和各种文娱活动外，省内外商贾辐辏，百货云集，形成大规模的物资交流市场，大牲畜、农具、农副产品、水产品、丝绸布匹、日用杂货、各种小吃等琳琅满目，交易活跃。庙会上除一般日用百货外，也有高档商品及名产上市，如江南丝绸、江西瓷器、福建的茶等等。故庙会还能够补充集市商品种类和档次的不足，满足农民婚嫁、年节之需，以及富贵之家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

清末，蓬莱县内有庙会 40 余处，莱阳庙会较大的有 12 处，共 56 处。牟平山会，较大的 33 处。荣成庙会有 30 余处。招远县有山会 9 处，庙会 41 处。

表 4-2 晚清登州府各县较大的庙会²

县名	地点	会期（农历）	地点	会期（农历）
蓬莱县	蓬莱阁	正月十六日	密坊	四月二十八日
	汰口山	二月初八	徐家集	三月初七
	北王	三月十五日	刘家沟	三月十四日
	蔚阳山	三月初三	龙山店	十月初一
	解宋营	三月初三	北王绪	四月十八日
莱阳县	皇姑庵	二月初七	徐家集	十月初七
	大乔	二月二日	照旺庄	三月二日
	沐浴店	三月十一日	龙旺庄	四月八日
	穴坊庄	四月二十八日	姜疃	十月五日
	莱阳城	十月十三日	西留	十月二十一日

¹ 山东省海阳县志编委会编，《海阳县志》，1988 年，第 101 页。

² 各地县志、市志。

	团旺	十月二十二日	羊郡	十月二十六日
	万第	十月二十六日	山前店	十月二十九日
	穴坊庄	十月二十三日		
福山县	烟台大庙	三月二十三日	毓璜顶	正月初九日
	黑芥庵	二月十八日	塔儿顶	三月初三
	太平庵	四月十八日	芝罘山	五月初五
海阳县	大阎家	二月初二	小纪	三月初三
	郭城	三月初三	大山所	三月初六
	瓦罐窑	三月十五	徐家店	三月二十八
	发城	四月初八	凤城	四月初八
	茂梓	四月初九	郭城山	四月初九
	从上	四月十八	留各庄节山	五月初三
	盘石店节山	五月初三	郭城节山	五月初四
	留各庄节山	十月初二	行村节山	十月二十七
	小纪节山	十月二十八		
宁海州	狼牙石	二月初八日	马格庄	二月十五日
	莱山玉皇神会	三月十六日	岳姑殿	四月十五日
	玉泉山	四月十六日	宁海州城隍	五月二十五日
黄县	黄山馆	七月初七	石良山	二月二十日
	台上古会	二月二十七日	芦头延真宫神会	三月二十日
	凤仪顶	三月二十日	天尊堡屯	四月十八日
荣成县	仙姑顶	二月二十日	马牙河	三月十五日
	蓬莱山	三月十五日	三台山	三月二十日
	群仙山	四月八日	玉皇	四月十三日
	槎山	四月十八日	水宫山	五月三日
	端午山	五月初五日	关公	五月十三日
	龙王	七月十五日	里岛山	正月十七日
	龙山	正月十五日	天后宫	正月十五日
招远	老母庙	四月十七日	岳王庙	四月十八日
	火神庙	六月二十四日	大社庙	三月初三日
	道头西庙	四月二十八日	饮马湾	七月十八日
	金华山	六月二十日	丁家庵	七月十五日
	杨化寺	三月十六日	西罗家	九月十六日
	石庙涧	四月初八日	普提寺	三月十六日
	郑家	五月初五日	端午庙	七月初一日

随着集镇商品流通规模的不断扩大，在集镇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较大规模的工商都市型的中心市镇。其中龙口可称晚清登州府第一市镇。

龙口位于渤海湾南岸，气候温和，为登州府一天然港口，“海口风静俗名稳油盆，商船往来未便于此”¹，海上交通十分便利，口岸贸易开始也较早。清代，直奉苏浙诸省有

¹ 袁中立等修纂：《黄县志》，卷二，疆域志，山川，1755 年刊。

频来龙口购鱼者，“北船来必粮酒，南船来必纸糖”，集中为市。咸丰五年（1855年），龙口停泊商船百余艘。1861年招远粉丝由龙口运往上海、香港，然后转运国外。龙口成为粉丝的重要集散中心，故称“龙口粉丝”。清末，龙口专营出口业务的粉庄有50多家，为龙口诸业之最。1927年粉丝出口（含招远县）2,620万公斤，占出口物资的86%，为粉丝历年出口额首位。进口货物以洋布、洋线、火油、煤炭、白酒、烟、麻、砂糖、豆饼、杂粮为大宗。其中进口绿豆为最多，招远、黄县就地销售25万石（约7,500万公斤）。出口货物以粉丝、供香、花生、花生油、草纸、沙参、白菜、果品及药材为大宗，其中粉丝出口最多。

龙口，城内商业较发达，计有钱业、杂货业、当铺业等50多个行业，商号620余家。商号主要集中在西街和西关街，仅西关街就有商号157家，且多数规模较大。民国初年，已有杂货店70余家，客栈60家，粮行50余家，行店10余家，轮船行3家，钱庄、银号40余家¹。商业的发达，促进了饮食业、旅店业、理发业等饮食服务业的发展，一时龙口店铺林立，客商云集，有“小上海”之称。酿酒业已相当发达，民国初年，仅龙口镇就有益源、东聚元、增泰昌、公顺兴等5家烧锅，从业人员120余人，年产高粱烧酒900余吨。近海渔业发达。民国初年，龙口港逐步形成规模，渔船将捕捞的渔获物直接卖给消费者或渔行。1931年有渔行12家。1910年龙口港有民商轮船1艘，1,200吨。

表 4-3 晚清登州府中心市镇统计表²：

集镇名（所在县）	商况	资料来源
龙口（黄县）	居民8,800人，为全县金融中心，有交通银行分行，钱庄六七家，均以此镇为主要集散地，年成交额500余万元，市面繁荣，冠于全县，商号90家。	《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分编，第2册，黄县《山东商业地理调查记》，龙口镇
石岛（荣成）	位于山东半岛东南角，湾域水深适泊，船舶多集于此，日集民船百余只。为本县“南部商业中心”，建有镇商会。大小商号177家，主要行业9个，以行栈（37家），渔业（46家）最为发达，年交易额670万元，县城商号30家。	《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分编，第1册，荣成县 《中国民国省区全志》第3册，第4卷，山东省志
水沟头（莱阳）	全县商业中心，大小商号100余家，以土产杂货为最盛。年交易额200万元。县城有商号120家，多系小本经营，在当地贩卖而已。	《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分编，第1册，莱阳县
夏村（海阳）	全县商业中心，在县城东70华里，贴近乳山口，本县大宗土产花生等在此镇集散，有商号50家。县城僻处海滨，少舟楫之利。	《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分编，第1册，海阳县

清末，龙口港客运渐兴。登州府及附近地区，人口多由龙口流移东北。每年来往旅客有万人之众。当时有英商太古洋行的“温州”（1,000吨）、“牛庄”（1,000吨），怡和

¹ 山东省龙口市史志编委会编，《龙口市志》，齐鲁书社，1995年，第51、174页。

² 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94-196页。

洋行的“怡生”(1,000吨),旗昌洋行的“芝罘”(1,300吨),中国肇兴公司的“肇兴”(1,375吨),日商东和公司的“第二永田丸”等轮船竞相航运。1912年有中日英三国轮船24只,566艘次,民间帆船260只来往于龙口港¹。

2、胶东首位城市——烟台

晚清登州府市镇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标志莫过于烟台从一个市镇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工商业城市,成为胶东首位城市,这是经济变迁的重要内容之一。

开埠以前,烟台已为国内重要的商贸港口。道光三十年,烟台有大小私营商户千余家,并有商会组织行帮等。开埠以后,烟台的贸易突破了国内贸易范围,直接同国外进行贸易。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已如前述。

开埠以后,随着口岸贸易的兴起,吸引着沿海地区的商人资本向烟台发展。先是黄县、掖县、潍县等商人资本,将资金转向烟台,接着福建、宁波、广东等地商人,纷纷在烟台开设栈庄商号,经营各项贸易。中外商号迅速发展,商埠区不断扩大。至1891年,代理商、批发商、零售商等各类商号发展到1,700余家(其中外洋商号11家),从业者达16,000余人,内小摊贩5,000余人,占当时烟台总人口的48%以上,全年营业额高达3,000余万银元(不含外商洋行)。

外国洋行发展迅猛,1891年时有11家,1901年达到26家,1902年发展到43家,较著名的有“福开森”公司、“和记洋行”、“盎斯洋行”、“捷成洋行”、“仁德洋行”、“士美洋行”“美孚洋行”、“三井洋行”等。这些洋行控制着烟台的进出口贸易以及航运、保险、金融等。在洋货进口方面,英国洋行和日本洋行是烟台进口洋货的最大经销商。烟台开埠初期,英国洋行垄断棉纱、棉布的进口。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洋行通过本国纺织品价格低廉、纱捻适合土机织布的特点,排挤英国洋行,成为棉纱的最大批发商。美国洋行经销的主要进口货物是棉布、煤油和面粉。烟台的土货输业也为洋行控制。盎斯、仁德、捷成、和记、百多、敦和6家洋行经营茧绸输业,在清末民初,年购入额达230万元,约占烟台茧绸输出额的55%左右²。在草帽辫、花边、发网业中,外国洋行在输出业务中占统治地位。洋行通过行栈资本组织农村妇女织花边、发网,然后将成品收购上来,精加工处理后,运销欧美市场。

华商大号有义昌铁行、天成栈代理店、福泰代理店、洪泰代理店、顺盛代理店、双盛泰绸缎庄、恒泰代理店和协泰绸缎庄,时称“八大家”。在各类商号中,以杂货业居首位,次为水果业、客栈业和鱼行业,共500余家,商房建筑5千余间³。

除了商业发达以外,烟台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近代工业也开始产生。最有代表性的是缫丝、织绸业。牟平进士王元挺在1902年刊行的《野蚕录》中说:“烟台之商务,以缫丝为大宗,即沿海百余里内之市镇,亦莫不以缫丝为恒业,缫丝房之大者,往往安车一二百架或数十架不等,是名内軋;无业贫民及妇女之无事者,授以蚕而代缫于家,是名外軋;仁眼福凑之躯,车声聒耳,比比皆然。”1881年设立的烟台缫丝局,资本1.4万元。1901年建立的华泰缫丝局,资本9万元,有丝车200台,缫丝机538架,机器价值2万元。此外还有益丰、益昌、恒兴德、汇昌泰、阜丰、隆大、同利等缫丝、织绸厂。

烟台其他工业还有酿酒业、日用玻璃、火柴业、印刷业、花边绣花业、草帽辫业、

¹ 山东省龙口市史志编委会编,《龙口市志》,齐鲁书社,1995年,第319、323页。

² 安源美佐雄:《支那の工业と原料》第1卷下册,1919年,第132页,转引自孙祚民:《山东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第568页。

³ 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7卷10期,1911年11月,300-301页

卷烟业、电力工业等。

表 4-4 清末烟台缫丝作坊及机器纺丝厂建立情况¹。

年份	手工作坊数	汽机纺厂数	情况
1903	16	3	工人 5500 名, 年产丝 8250 担
1904	18	3	
1905	25	3	工人 9000 名
1906	20	3	工人 8500 名, 年产丝 10546 单, 汽机纺局 3 处共产丝 487 担
1908	22	3	
1909	38	3	共用职工 17000 名, 股本银 500 万两
1911	40	3	工人 14000 人, 年产丝 14000 担, 已说本年作坊 43 家, 闭歇 6 家, 机器纺厂亦未开工

随着烟台工商业的不断发展, 烟台已经从小市镇, 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工商都市。宣统初年, 张相文旅经烟台, 据其所见: “市肆环列, 马路宽平, 山坡间富商之亭台别墅错出,”²已见都市色彩。

从 19 世纪 60 年代, 英、日、德、法、俄、意等 15 个国家纷纷围绕烟台山建领事馆、银行、医院、邮电等, 一直向东海岸拓展, 形成了以朝阳街为中心的商埠区和外人居住区。1894 年, 城区形成以北大街天后宫为商业兴旺中心的港口巨镇, 之后逐次向外发展, 西至圩子门, 东至广东街, 南到奇山所城, 北到海滨。计东西长 16 里, 南北宽 8 里, 有 12 条主要街道, 已经具有城市的形状。

表 4-5 晚清烟台民族工厂公司建立情况表³:

成立年份	名称	资本(千元)	经营性质	创办人
1881	烟台缫丝局	14 以上	商办	唐茂枝
1901	华泰缫丝局	90 以上	商办	梁浩池
1902	益丰缫丝局	90 以上	商办	谦豪丰
1895	张裕酿酒公司	1000	商办	张振勋、张应东
1909	张裕玻璃瓶厂		商办	张裕酿酒公司
1905	华商电灯公司	210	商办	孙克选
1913	烟台电灯公司	120	商办	
1905	北洋烟草分厂	20	官商合办	
1905	仁增盛烟草厂	56	商办	孟昭颜
1905	隆盛烟草厂	14	商办	王廷彬
1905	恒利纸烟厂	70	商办	易怀远
1905	中安烟草厂	28	商办	唐世鸿
1906	协成铁工厂			

烟台开埠以后, 交通得到了发展。在陆路方面, 最主要的道路是途经福山、栖霞至潍县的大道, 这是一条重要的货运商路, 即烟潍商路。它沟通了与山东内地的联系, 烟

¹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第 2 卷, 359-361 页;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 2 辑下册, 第 802 页。

² 张相文:《齐鲁旅行记》,《南园丛稿》卷 4, 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 第 30 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8 年影印本。

³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 2 辑下册, 科学出版社, 1957 年, 第 880、912 页。

台进口货物不仅运销到黄县、掖县、潍县，而且运销到周村、济南等地。内地土货如周村黄丝、大汶口花生、鲁西皮货及草帽辫、豆货等经商路运到烟台出口。另外是由烟台向东通宁海、文登和荣成，向南可达莱阳和海阳，直到青岛，形成烟青商路。

在航运方面，烟台航运业得到较大发展，开通了许多航线。19 世纪 80 年代，以烟台为中心的商船货运航线主要有山东沿海航线、辽东、天津、江浙、闽广航线，而出入烟台港的货船既有山东沿海港口的船只，也有牛庄、天津、江苏、宁波等外省船只，其中山东本省货船为数最多。19 世纪最后 10 年，属于烟台本地商人所有的沿海货运帆船约有 200 只，船的载重量为 150-300 担，另外约有 2,500 只帆船往来与山东与辽东各民船港，从事土货航运贸易。当时烟台近海航线囊括了山东沿海主要民船港，如金口、威海卫、石岛、俚岛、养马岛、长山岛等，均与烟台有着密切的航运关系¹。

通过向周边沿海辐射的近海航线，不仅扩大了烟台土货出口资源，而且扩大了进口货的运销渠道和范围。1908 年烟台东口设民船到口“挂号之卡”，自此“可得民船数目并载重之实在详情”。1909 年进港民船总数 8,355 只，载重 142.8 万担，约合 35.7 万吨，超过了常关轮船进港吨位（32.9 万吨），民船载货总值 1,400 万银两²。

1905 年，由各航路进出烟台港的民船总数为 11,445 只，此后逐年增长，1911 年进出港民船数和货运量达到顶峰，这一年民船数达 16,448 只，货运量达 279 万担。

此外，近代轮船航运业得到发展。1873 年清政府在上海成立轮船招商局，开辟北洋航线。1876 年招商局船只进出烟台港的航运吨位达 18 万吨。

表 4-6 晚清烟台港华商轮船公司³

公司名称	创历年月	资本	经营性质	创办人	船只数
清美洋行	1860	8.5 万元	商办	李振玉、郭九山	
顺义公司	1901. 6	6 万元	商办		5
振飞公司	1903. 3	4 万元	商办		1
小清河轮船公司	1904	10 万两	商办		
政记轮船公司	1905	4 万元	商办		3
仁汉轮船公司	1905				1
毛合兴公司	1906. 8	2.5 万元	商办		1
泰记轮船公司	1910	2 万元	商办	张葆田	
靖安轮船公司	1910	1.8 万元	商办		
宁福轮船公司	1910	1.1 万元	商办		
北海轮船公司	1910	10 万元	商办	李奎耀	

外国洋行也开展国内外航运线路。1867 年 9 月，英国商人福开森（H·H·Fergusson）在烟台开办的福开森公司开辟了英国至烟台的直接航线。此后英国太古洋行，也在烟台设立代理处，经营沿海航运业务。1888 年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开辟了通烟台的北洋航线。1873 年以前港口航运几乎为外国船商所垄断。1901 年进出烟台港的外国船只达 5,752 艘，而中国船只有 73 艘⁴。

1906 年为了抵消胶济铁路和青岛港对烟台的不利影响，烟台绅商曾经提出商办烟潍铁路的要求。虽然未成功，但反映了民间改善烟台交通条件的广泛要求。

¹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icennial Reports on Trade, Industries, etc., 1892-1901, Chefoo, Vol. I, p.70; I.A. Donnelly, Chinese Junks and other native Craft, 1924, pp.37-48.

² 上海通商海关造册处译：《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1910 年，烟台口，第 24 页。

³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年，附录，第 477-488 页。

⁴ 孙祚民：《山东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567 页。

此外烟台在医疗卫生、教育文化、邮电通讯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使城市发展得以完善。

烟台城市经济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吸引着人们向烟台聚集。体现着现代文明城市的特点。据东海关统计，1881年烟台从业人口3,500人，1891年以前，每年到烟台的移民平均约300到500人，至1891年，烟台的从业人口约32,500人，大都来自登州府地区。1901年，烟台的从业人口增加到57,120人，净增了24,620人，平均每年增加2,462人，人口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了¹。

在传统封建城市中，社会阶层单一，居民结构主体是士、官、商。烟台开埠后，伴随近代工商业的产生，职业结构开始多样化，阶层也多极化。

表 4-7 1891 年烟台从业人口分布表²

行业或职业	个数	从业人数	占总从业人口百分比
商店、油坊等	1,660	9,620	29.6
旅馆	50	260	0.8
鸦片烟馆	132	320	1.0
妓院	245	745	2.3
私人公寓	435	2,175	6.7
海关和衙门雇员		350	1.1
外国洋行中的中国雇员		230	0.7
学者和学士		250	0.8
叫卖小贩		5,500	16.9
港口驳运舢板	1,200	2,400	7.4
装卸工与其他工人		10,650	32.8
总计		32,500	100

此外，伴随近代工业的产生，还形成了早期的工人阶级。比如1903年烟台有手工及汽机纺丝局共19家，5,500工人，1906年增至23家，8,500余工人，到1909年又增至41家，17,000工人³。1911年烟台普通小工的工资是日酬250-300文，木匠、泥水匠日酬220文（管饭），缫丝工月酬12-14吊（管饭），雇农年酬50-60吊（管饭），普通铁匠月酬6-7吊（管饭），柞绸织工月酬10-12吊（管饭），仆役月酬5-7吊（管饭）⁴。工人阶级被称为“一个有势力的社会阶层”。出于经济或政治的考虑，他们开始以集团的形式参与社会活动，如1906年烟台市民和工人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外国人议设公董局⁵。

随着商品流通的不断扩大，市镇经济规模的发展，晚清登州府地区，逐步形成了以小集镇产地市场为初级市场、以大市镇和县城为集散的中间市场和以烟台为中心市场的三级市场贸易体系。土货从初级市场，经过中间市场不断向烟台中心市场聚集，形成从下到上的流通格局；洋货、工业品从烟台中心市场，或直接或通过中间市场，向乡村集镇疏散，形成由上往下的流通路线。大量土洋货、工业品的双向流通，带动了晚清登州府地区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

¹ 王守忠、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8-129页。

²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icennial Reports on Trade, Industries, etc, 1882-1891, Chefoo, p55.

³ 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近代卷，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⁴ 《东方杂志》1卷5期，实业，第57页，转引自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680页。

⁵ 刘桐钧、董礼刚主编：《莱海招抗捐运动与辛亥革命》，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五、晚清登州府商业资本的变迁

1、传统商业资本的发展

登州人，自古有经商传统。据《登州府志》记载，该府“地狭人稠，境内所产不足以给，故民多逐利于四方”；又言“府境属皆山，裨海环其外，境以内无五十里之平壤，食货所资惟田农拙业，而地狭人稠不足以更费”，故“山民务茧丝，海民竞渔盐，……若夫操末业走四方者多营末富”¹。府治蓬莱“郡处海滨，民贫土瘠，……多泛海以谋生者”²。栖霞县小民“贫则轻去其乡，至航海数年弃妻子而不顾”³。文登县民亦多“越海贸易”，获利颇巨；乾隆年间开石岛海口，海船贸易往来多于此停泊，“南货云集”，更使“逐末者众”⁴。黄县“地狭人稠，……养生者惟贸易为计”；该县居民经商于外者“辽东为多，京师次之……倏往倏来，常获厚利”；大贾更“自造舟贩鬻，获利尤厚，于是人相艳视，趋鹜日众”⁵。不仅一般百姓多以贸易为生计，甚至儒学士子弃儒经商者也比比皆是。

登州府各州县外出经商者大抵以辽东为多，江南、京津次之。苏州有登州等山东商人的商号数百家，并建有“东齐会馆”；在上海经商者有登州帮、文莱帮等商帮，势力也很雄厚⁶；山东商人在京津多经营绸布、饭庄、估衣等行业⁷；在东北的大连、营口、奉天、哈尔滨等主要城市中，多有黄县商人执商界之牛耳。除外出经商之外，在本地从事牙行、典当、商贩者也为数众多。如黄县“居肆而贾者东街有衣肆，南关有粮肆，西关则列肆数百”；小民从事负贩之业者更是“百十为群以骡驴负货而至”⁸。经商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居民的从业结构。如同治《黄县志》记载称：“总黄之民而计之，农十之三，士与工十之二，商十之五”⁹。如果按照这一比例计算，该县从事商业的人口已超过农业人口；即便不把这一记载视作实际的比例数字，经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当也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而经商人口比例的增长，实际上也反映了商业在经济构成中所占比例的增长。正是这一结构性的变化，黄县虽地寡人众，“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却以东省“富庶之区”而著称。他如威海等地商业所创造的财富，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登州府地区经济的繁荣与富庶¹⁰。

在晚清，登州府地区的商业资本仍然主要是传统的当商、钱商。

典当商，属于一种以物资作抵押、施放高利贷的商人资本，一般不直接经营商品，但与商业资金的拆借周转也有一定关系。在商品流通不发达的传统经济条件下，因利润高、风险小，相当一部分社会剩余资本被吸引入典当业，而不是流向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直接相关的领域。清代中叶，是典当资本发展的极盛时期。清初，黄县始有当铺，乾隆二十一年（1756），县内有当铺12家，光绪年间有13家。光绪年间，蓬莱县城南街有“天

¹ 贾瑚等修纂：《登州府志》卷首，小序；卷六，风俗，1881年刊。

² 王文焘等修纂：道光《蓬莱县志》卷十二，艺文，1839年刊。

³ 卫莒等修纂：乾隆《栖霞县志》卷一，风俗，1754年刊。

⁴ 李祖年等修纂：《文登县志》卷三，赋役；卷二，风俗，1922年刊。

⁵ 尹继美等修纂：《黄县志》卷三，食货志，1871年刊。

⁶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第368-372页；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2-73页。

⁷ 李华：《山东商帮》，台北万象图书公司，1995年，第182页。

⁸ 尹继美等修纂：《黄县志》卷三，食货志，1871年刊。

⁹ 尹继美等修纂：《黄县志》卷三，食货志，1871年刊。

¹⁰ 尹继美等修纂：《黄县志》卷首，彙易图序，1871年刊；王士任等修纂：《威海卫志》卷九，艺文，1742年刊。

祥”当铺，时为全县最大当铺。莱阳有庆来、瑞来、天复、仁治、洪昌、长裕 6 处当铺，每铺年征税银 5 两，规银 4 两，当铺均系黄县富商丁义廷开设。海阳有永昌、熙春、联春、荣春等当铺，后三者都为黄县丁百万开设。

钱商资本，也称银钱号即以钱庄、汇兑庄为主的商人资本。钱商资本以银钱拆换为业，兼营存款、放款、汇兑等。再以后有票号、汇兑庄和银钱号。票号、汇兑庄以汇兑为主，兼营存放款。银号初为资本金和营业额较大的钱庄，后来与钱庄没有严格区分，而依习惯，把经营存放汇兑业务的钱业或称为钱庄，或称为银号。开埠前，钱商资本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县城。开埠后，由于贸易往来的频繁，钱钞汇兑的增加，为蓬莱、黄县等地钱业资本的兴起提供了条件，1871 年黄县县城西关有钱庄数十家。光绪初年，县内有钱庄 60 余家，1904 年增至 168 家。一度有“资本家集中地”之称。光绪年间，海阳县有兴清、汇春、永源、会源、兴泰等共有钱庄 40 余处，还有西协盛、德盛春、复生堂等汇兑代理店¹。

福山县最早的钱庄是通生号，创办于道光三年，民国初年，发展到 16 家。19 世纪 80 年代，烟台除有一家山西票号（汇兑庄）外，还有三家总号设在北京的信贷庄，信贷庄是当地唯一的货币贷放商，每笔业务通常在 2000-3000 两之间²。烟台到 1901 年汇兑庄和钱庄共有 28 家。烟台的汇兑庄大都是骡马店出身，兼营银钱汇兑业务，其根据地为胶东各县及烟台、威海等埠，势力所及，远达东三省。汇兑庄大都有发行钞票的权利，其中以顺太号和谦益丰号最大。顺太号发行 1-50 元的鹰洋票，谦益丰发行 2-500 两的漕平银票。这两家庄号还经营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贷款。烟台有 17 家钱庄除发行钱票外，还经营银钱兑换业务。

但晚清登州府当商、钱商等传统商业资本逐渐不能满足工商业的发展需要，这不仅因为它们普遍存在规模小、资金少的缺点，难以适应跨地区、跨省界的远距离大额交易活动，而且因为它们的经营机制落后，也难以适应近代社会商品流通对信贷资金和信贷运作的要求。在登州府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众多农民入城工作或从事手工业与运输业，谋生手段增多，经营环境的变化，减少了高利贷上对典当业投资的兴趣，使不少典当商转移资金，转向其他行业谋求发展，蓬莱、黄县典当资本就有不少转向辽东地区，从事贸易和汇兑经营。此外战乱和兵灾匪祸的破坏，致使大批典当、钱庄财产受损。黄县曾是山东银钱汇兑业务最集中且最发达的城镇之一，“富户多质库，不暇经营，坐拥自然之利，自捻匪扰乱以来，质库巨资付之一炬”，户数骤减³。

新式银行业在登州府的出现也对传统商人资本带来严重冲击。晚清登州府最初银行由外国人所办。在烟台主要有汇丰、正金、麦加利、法兰西、华俄道胜银行等代理机构，其中“仅华俄道胜银行吸收当地定、活期存款，并借贷取息”⁴。1898 年，中国通商银行在烟台设立分行，成为山东境内开办最早的华资银行。1904 年山东官银号在烟台设立了分号，大清银行也于 1910 年在烟台设立了支行，交通银行烟台支行设于 1911 年。此外保险业也开始出现。1875 年在上海成立的招商保险局，其公布的第一批办理保险的口岸中包括烟台。但是华资银行势力都很弱，社会金融流通，仍以钱业为主。

2、 新型行栈资本的形成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及内地普通华商直接与洋商打交道的事较为罕见，

¹ 山东省海阳县志编委会编：《海阳县志》，1988 年，第 491 页。

²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rade, Industries, etc, 1882-1891, Chefoo, p. 72.

³ 尹继美等修纂：《黄县志》卷三，食货志，1871 年刊。

⁴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Vol. I, Chefoo, p. 71.

绝大多数交易都须有买办居间介绍，牵线代理。美籍学者郝延平曾形象地将买办比作 19 世纪中西间贸易的桥梁¹。事实上，与买办打交道的华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行商、号庄、或散商，而是具备特殊商业功能的行栈商人资本。在晚清登州府地区，随着中外商人贸易接触的增多，一部分行栈商成为外商土洋货贸易的间接和直接代理商，逐步取代了买办，成为中外贸易的新桥梁。

烟台开埠以后，口岸商品贸易的迅速发展，改变了旧有的商品流通格局，土货产品由广大内地市场向口岸市场汇聚，进口洋货从口岸市场分流，都要经过若干商人贸易环节，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商人需要某种商人资本做联系纽带，来实现大宗商品的买与卖，从而完成大宗商品的异地流通；另一方面，纺织、粮油加工等机器工业的兴起，缫丝、织绸、草辫、粉丝等近代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既对各类农产品原料产生了大量需求，又对大批制成品的市场销售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大量农产品以及丝绸、粉丝等手工业产品从内地初级市场转输至口岸市场，或者将大宗进口洋货由口岸转运至内地市场，这对以传统方式从事经营的店铺来说是无力胜任的；而集中于口岸市场的买半商人因资本单薄、人数有限（1892 年时烟台有大小买办总共只有 43 人），也难以独当此任。于是一种新式近代商人资本——行栈资本——便应运而生。

烟台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开埠前，“向无行户，闽广船到，必投所相知者”，与闽广客商“相知”的当地商户，“乃揽以为客，为之代觅售主，买卖两边，各得行用二分”。对于这种商户，当时清政府官员称其为“私充行户”，以区别于由官府颁发牙帖的牙户、牙行²。其实这种“代觅售主”收取行佣的“私充行户”，正是烟台早期行栈的雏形，也是后来行栈资本形成的基础。1862 年烟台开埠通商后，随着土洋货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各路巨商云集，顿添行铺数百家”。此时，经营范围广、收益稳定的行栈业便成为各帮大商人竞相涉足经营的领域。当时烟台商埠内“商家则以行栈为最巨，代客船买卖货物而扣其用，业此者盖不下数十家”。19 世纪 80 年代后，除摊贩零售业外，凡是大宗商品交易大都要经行栈之手来进行³。

行栈商在烟台通称外庄家，又称行店或大店，当地俗称“大屋子”。行栈之所以有“大屋子”之称，是因为行栈通常都有供客商洽谈贸易的宽敞铺面和存放货物的仓栈，并能为前来交易的外地客商提供食宿。行栈（外庄家）的经营业务以接纳客商、媒介交易、代办购销为主，同时也自营某一类土洋货批购批售业务。到 20 世纪初，除油坊及柞蚕丝业主外，烟台当地“最有实力的商人是各种行栈”，“商品交易通常总要经中介商之手，直接进行买卖的情况甚少”，当时“凡欲买进或卖出货物的内地客商悉寄寓于外庄家，并通过外庄家进行交易。客商运来货物后，外庄家便为其找寻中外商人，觅揽买客。对意欲采购货物的客商，外庄家则为其找寻合适的货品”⁴。烟台资本实力最雄厚的行栈集中在粮食、水产、棉纱、砂糖、木材、茧绸、杂货、药材、豆油等行业。各帮之中以山东帮行栈资本势力最大，资本额在 5 万银两以上的行栈就有 26 家，资本总额达 600 余万银两。其中资本额在 10 万两以上的行栈有水产商大成栈（100 万两）、西公顺（20 万两），杂货商双顺泰（20 万两）、瑞盛（15 万两），谷物商万顺永（50 万两），油商双盛泰（100 万两）、万顺恒（100 万两），棉纱商万盛栈（10 万两）、怡美（13 万两）、万盛和（10 万两），砂糖商晋盛（30 万两）。这些商号在青岛、上海、大连、日本、朝鲜、海参崴设有分店，购销行止对市场行情有相当的影响⁵。到了民国初年，烟台行栈商约在 300 家以上，

¹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序言。

²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 1 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54 页。

³ 于宗潼等修纂：《福山县志稿》，卷五，商埠志，商业，1931 年刊。

⁴ [日]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 4 卷，《山东省》，1917 年，第 954，956 页，转引自庄维民：《近代山东行栈资本的发展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0 年 5 期。

⁵ [日]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 7 辑，1908 年，190-192 页，转引自庄维民：《近代山东行栈资本的发展及其影

占当时商号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分布于杂货、丝绸、棉纱布、花生、豆货等20多种行业,在烟台当地及登州府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¹。宁海“所产山茧之丝,缲制成后,办系赴烟台恒兴德、华丰等行栈销售”,然后由行栈运销上海;招远,“凡未制之丝,均向黄县天兴、元增等栈发卖,转运奉天销售”²。烟台为国内最大的茧绸集散输出市场,出口量约占全国出口量的85%。经营茧绸大宗贸易的商号为绸栈和绸庄。1907年前后,烟台绸栈、绸庄总共约30余家,著名绸栈有和成泰、万顺恒、裕普德、恒兴裕、裕顺公、东顺利、春生栈7家,其中和成泰、万顺恒规模最大,两家绸栈茧绸年交易额约10万匹,而其余绸栈、绸庄的交易额大致也为10万匹左右。此外,由于登州府地区是缺粮区,烟台还是重要的粮食集散市场。1906年,烟台有粮行20家,民国初年增至上百家。烟台粮行主要从东北地区和羊角沟输入粮食,供应城市粮店、杂货铺和本地油坊、粉坊,另有部分转销于登州府各缺粮县。粮行经营采取分帮分业方式,如从事大豆贸易的30多家粮行分成14帮,分别与来自14个产粮地的粮船进行交易,从事谷物交易的粮行按货源地不同分成7帮,有的粮行则专门经营小麦、玉米、绿豆、大米等粮食交易³。

还应该看到,在晚清登州府手工业转型过程中,行栈资本通过投资参与经营、组织生产购销、控制原料与产品供销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手工业的转型。比如登州府地区重要的粉丝加工业就是一个典型。开埠通商后,粉丝加工业商品化生产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生产购销形势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粉丝生产所需豆类原料大部分系由行栈商自大连、营口等地购入,粉坊加工的粉丝由具行栈性质的收粉庄收买,经整理包装后输往南方和国外。清末,烟台共有收粉庄30家,龙口有收粉庄16家,分别由烟台帮、潮帮、福建帮商人经营。经营收运粉丝的粉庄、从事生产的粉坊(又称“推粉家”)、提供原料的粮行,三者之间有着稳定的产供销关系。粉坊生产粉丝运给烟台、龙口的粉庄,换取现金和“粉票”,粉票可以在龙口市场流通,粉坊持粉票到两行购进绿豆原料。这样,在粉丝生产中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行栈制”。随着口岸贸易带来了新的商品,新的需求,使得资本势力不断强大的行栈商人开始对投资近代工矿业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出现了相当数量由行栈商人兴办的工矿企业。代表性的就是由烟台同泰和杂货栈的经理唐世鸿兴办的烟台中安烟草公司⁴。

在晚清登州府商业资本的发展中,行栈商的兴起与发展,对于近代市场流通主体无疑是一个转变。它改变了传统的牙行、牙纪经营方式,在商品流通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行栈商不但是市场变化的产物与新贸易趋势的受益者,而且也是其推动者。在中外贸易、大宗商品远程贸易、国内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领域,行栈商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扮演者多重角色。他们的经营与近代市场结构、商品流通格局的变迁相融合,各商业贸易形势以及交易方式带来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行栈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标志着行栈商已成长为具有某种近代化特征的商人资本。利润的逐年积累,势必导致资本扩张与转移,清末,在登州府地区,行栈商的活动已超越纯商业的范围,开始渗透到手工业和近代工业领域。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大而化之,资本主义就是通常为着利己的目的把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方式”⁵。可以说,行栈商由商业积累资本,其投入近代工业的活动,实际也是近代商人“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当然也应看到,这种过程,在晚清时期的登州府地区,仅为初始阶段,其程度是很低的,不能过高估计。

响》,《近代史研究》,2000年5期。

¹ [日]青岛守备军民政部:《东北山东踏查报告》,1920年,第375-384页,转引自庄维民:《近代山东行栈资本的发展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0年5期。

² 山东展览会报告编辑处编:《山东第一次物品展览会审查报告书》,第2编,1915年,第140-143页。

³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264页。

⁴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283-284页。

⁵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07年,第86页。

结 语

晚清时期的登州府，自烟台开埠以后，在口岸贸易的带动下，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不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甚至消费领域都出现一些新的因素，促使经济结构产生具有近代意义的变革。

首先，口岸贸易是晚清登州府经济发展与结构变迁的前提和基础。

烟台口岸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扩大、贸易量的增长，推动了该地区农业商品化，手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发展，带动着晚清登州府乡村与烟台口岸城市的商品流通与经济发展。

口岸贸易刺激了对出口商品的需求，为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辟了一个新的广阔市场，使之走出地方消费流通的狭小圈子，作为商品进入到远程贸易中。这就带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登州府地区农业生产的花生、豆类、烟草、柞蚕、药材、果品、蔬菜、鱼产品等，手工业生产的茧绸、豆油、粉丝、草帽辫、花边、发网等产品成为重要的出口资源，其出口量在当时中国整个出口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口岸贸易成为变迁的重要动因，不断改变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面貌。在贸易需求的刺激下，花生、豆类、果品等经济作物得到较快发展，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¹，形成专业化的生产区，农业生产结构出现调整 and 变化。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经济作物的排挤，小麦、高粱等粮食作物的商品化也得到提高。在农业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雇工生产的新型生产关系。在手工业中，为了适应向国外市场出口的需要，缫丝、茧绸、榨油、粉丝等传统手工业得以重兴，草帽辫、花边、发网等新型手工业也开始崛起。登州府地区成为国内外市场上手工业产品的专业产区。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矿业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标示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与结构变迁。工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对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以期提高工农业生产。比较明显的就是对美种大花生的引进，迅速提高了花生产量，扩大了出口规模。此外还有美种棉、新果树品种、桑苗等等。登州府地区传统的大框缫丝开始改为小框丝技术。19世纪80年代末，烟台一部分丝坊为生产国外市场需要的小框丝，开始对旧式大框缫车和缫制技术加以改进，将丝框缩小，以4-6茧为一绪，缫制小框丝，使缫成的丝绞周长比原先缩小了二分之一²。到19世纪末，烟台各缫丝工厂已普遍采用西式脚踏小框缫车，取代了原先的手摇大框缫车。到20世纪初，烟台已成为国内小框丝缫丝业的中心。

其次，口岸贸易与加工工业的发展，促使晚清登州府地区市场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在登州府地区，传统的商品流通，主要是粮石、鱼盐等基本农业产品和粉丝、茧绸等少量农产加工产品，流通量很小，规模不是很大。进入晚清，随着口岸的开辟，与世界市场接轨，商品流通结构与市场结构发生变革。登州府地区的商品流通量不断增大，流通规模不断扩大，这可以从烟台进出口贸易规模中充分显示出来。流通结构就是土洋货、工农产品的双向流通。同时市场结构也发生变化，商品流通已不再局限于市镇集市和区域性市场，围绕口岸进出口贸易形成的商品流通格局，扩大了商品流通的范围，服务于口岸市场的各类中间市场相继兴起，内地集镇市场的商品集散功能得以增强³。登州府地区逐步形成以中小集镇为初级市场、大的市镇与县城构成的中级市场和以烟台为中

¹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64页。

²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icennial Reports on Trade, Industries, etc., 1882-1891, Chefoo, p.67.

³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77页。

心市场的市场网络体系。中小集镇分布于登州府广大的农村地区，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从这里为起点向上流动，经过中间市场进入烟台中心市场或直接进入中心市场，这是由低到高的流通层次；中间市场，主要包括大的市镇如龙口、石岛、威海等以及各县县城，这是一定范围内的土洋货集散中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心市场是烟台，是登州府地区城乡社会进出口贸易中心和最大的土洋货集散中心，并且与世界市场接轨。洋货顺着由高到低的层次流通。大量原先只能在初级市场消费的农副产品脱离自然经济的藩篱，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与此同时，原先仅能在口岸流通的洋货，也大量涌入内地乡村市镇。两种流通同时改变了商品流通的传统格局和内地市场的商品消费结构，使市场商品流通发生整体性的变迁¹。

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大宗商品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市场交易方式、贸易形式的进步。在晚清登州府地区，传统的钱业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但新的因素也已经出现就是银行业以及行栈业与行栈商的出现。行栈商采取了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商业特征的委托代理、合同购销、商业信贷、票据承兑与汇兑等交易方式。行栈商取代传统的特许商、高利贷商和典当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商。促使登州府城乡形成一个土洋货购销网，华洋商人资本的购销活动表现为洋行、行栈、号庄、商贩、生产者或消费者之间的商业联系。洋行借助行栈扩大洋货内销市场，寻求土货货源；内地商人则需依赖行栈代办洋货，疏通土货销行渠道。包括典当、钱庄旧式商人在内的大批商人，陆续转入经营土洋货交易的行栈业。行栈商借助新的经营方式，积累资本，势力膨胀。随后经营范围逐步向工业领域拓展，兴办工业企业，为近代工业化提供了条件。

再次，晚清登州府经济结构变迁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首位城市——烟台的形成。

烟台作为登州府晚清时期兴起的唯一城市，是这时期工商业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业迅速扩大的结果。它的形成对晚清登州府的经济的发展及社会变迁都产生重要影响。烟台直到19世纪末，是山东省唯一的开放口岸，也是当时北方三大国际贸易口岸之一。烟台开埠后，中外商人云集，商行林立，工商业、航运业迅速发展，是重要的工商业中心，成为登州府出口农副手工业产品的集结地和进口洋货、国内工业品的销散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登州府地区以烟台为中心形成一个烟台经济区。烟台经济区的出现，表明新型的近代意义的工商业城市取代传统的政治消费性城市，城乡一体的互动关系改变传统的城乡隔绝关系，从农村文明向以城市文明为特征的现代文明迈出了重要一步，“现代化的发展是以城市的发展来衡量的”。

烟台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业经济向工商业经济转移的过程，就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烟台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尤其是缫丝、织绸、榨油、粉丝等手工业，由原来的农村地区的家庭手工劳动，吸引到烟台进行工场生产和机器生产。1911年烟台缫丝业手工作坊40家，机器纺丝厂3家，工人14,000人，年产丝14,000担。新兴的船舶修造业、蛋粉业、酿酒业等开始出现，改变着传统的经济布局 and 结构。烟台是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工商业城市，开埠以后贸易扩大吸引了外国洋行、国内行栈商等商人资本和大量工商业人口云集烟台。1902年洋行总数达到43家。20世纪初，烟台的商号有1,780家，从业人数13,000人，客栈310家，从业人数1,100人。以铁匠为例，1882年就业人数仅为500人，随着进出烟台货物的增多，为牲畜打挂蹄掌的手工打铁业兴起。到1891年就业人数就达到5,000人。在传统封建城市中，社会阶层单一，居民结构主体是士、官、商。烟台开埠后，伴随近代工商业的产生，职业结构开始多样化，阶层也多极化。形成了早期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

烟台随着工商业、邮电航运业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市政建设不断完善，首位城市开始形成。

¹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179页。

但是,1906年后烟台港贸易开始由盛而衰。烟台港因海口较宽,缺少海坝屏蔽,一遇大风,港区内波涛汹涌,商船屡屡受风浪损害,这一状况自开埠后长期未得到改善。另外,烟台地处胶东丘陵地区,与内地货物往来除部分经由羊角沟、龙口转运外,大部要靠骡马驮运,能够通行大车的大路只有烟潍路一条,交通不便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烟台港的吞吐集散功能。此外20世纪初,烟台港对外贸易面临青岛港、大连港等的有力竞争。青岛港现代化港口设施的建成使用,胶济、津浦铁路的相继通车,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商货流向,大宗进出口商品改走青岛,两路一港几乎把铁路沿线和广大内地的商货资源占夺一空。大连港的开放,烟台中转枢纽港的作用丧失,这使得烟台由北方一大货物集散港降为辐射范围仅限于登州府沿海地区的二流口岸。

烟台港贸易地位的下降,使烟台的工商业一度受到影响,一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离开烟台,城市人口下降,城市发展趋于停滞。也严重影响了登州府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晚清登州府地区经济的“依附性发展”。

烟台开埠通商以后,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使登州府地区日益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且处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地位。晚清登州府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外商洋行仗仗雄厚的资本和通商税则特权,控制着烟台、威海等地的远洋航运和保险业,在贸易、金融等领域占据着极大的市场份额,严重影响着华商资本的正常发展。1882年烟台有9家洋行,1901年达26家,1902年总数增加到43家。洋行控制着航运业、贸易、金融、工矿业等各个方面。在航运方面,自烟台开港起,港口航运便为英、德、美、日等国洋行所控制,较大的有怡和、太古、士美、盎司、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公司等。甲午战争前,进出烟台港的外国船只每年约1,500艘左右,到1901年达5,752艘,而中国船只有73艘。洋行除经营航运业外,大都兼营保险业和进出口业,并拥有自己的仓库甚至专用码头,货物装卸与贮存发运都极便利。而华商轮船公司因不具备这些条件,在航运市场上常常处于不利地位。进出口贸易是洋行的主要经营业务,在洋货进口方面,英国洋行和日本洋行是烟台进口洋货的最大经销商,棉纱、棉布、煤油和面粉等几乎全部由洋行垄断。在土货输出业,很大程度上也为洋行势力所控制。晚清烟台有盎斯、仁德、捷成、和记、百多、敦和6家洋行经营茧绸输出业,年购入额达230万元,约合当地茧绸输出额的55%左右。从19世纪70年代初,洋行开始在烟台试办草帽辫输出,后来包揽了草帽辫向国外的直接输出业务,烟台华商输出草帽辫或者要经烟台的洋行代为经理,或者要通过上海等口岸的洋商办理转口,运销量和市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洋行制约。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外国对华贸易的增长和贸易网的扩大,外国在华银行的金融活动也跟着相应扩大。到19世纪末,在烟台开设代理处的已有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法兰西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彼得堡国际银行、俄华道胜银行等7家银行。外国金融资本承揽洋行的国际汇兑,为洋行进出口贸易服务,后来进一步与国外工业资本结合,参与工矿业投资,经营矿山和航运,发行货币,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活动触角伸到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成为影响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重要因素。

从晚清登州府地区经济结构来看,出口农产和加工产品、进口机制消费品的殖民地型结构初步形成。由于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登州府地区的花生、大豆、柞蚕、药材、水产品等农副产品和榨油、粉丝、茧绸等手工行业,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其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城乡农户与手工业者与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受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及价格的制约。为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草帽辫、花边、发网业等新兴行业的出现,更是完全与国际市场接轨,其发展兴衰听命于海外市场。这种经济结构的依附性和半殖民地性,使晚清登州府的产业结构畸形发展。比如工业发展的落后。在晚清,外国对登州府地区的经济入侵以商品输出为主,中外商人无暇投资于近代工业,工业资本缺乏,许多现代企业因资金不到位而夭折,发展过程中也不能迅速进行资本积累和机械的使用。此外,

登州府地区的工业，主要是围绕着进出口贸易而发展的榨油、缫丝、织绸、粉丝、草帽辫、花边、发网等食品工业和丝织业，大都是轻工业。这些轻工业多数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上，近代意义上的工厂大工业十分稀少。这严重影响了晚清登州府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

总之，晚清登州府地区，在烟台开埠通商以后，由于口岸贸易的兴起，带动了工农业的经济发展，促使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变化。晚清登州府地区与全国一样，其经济增长是一种“依附性发展”，同时由于青岛、大连港口的有力竞争以及近代铁路等交通建设的落后，限制了晚清登州府地区经济的正常发展。

参考书目

专著、文集、文献资料：

-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3、列宁：《列宁全集》第3、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4、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6、安作璋：《山东通史》明清、近代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7、孙祚民：《山东通史》上下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8、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 9、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 10、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 11、张利民、周俊旗、许檀、汪寿松：《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 12、丁抒明等：《烟台港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
- 13、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14、山东展览会报告编辑处：《山东第一次物品展览会审查报告书》，第2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
- 15、王培荀：《乡园忆旧录》，济南，齐鲁书社点校本，1993年版。
- 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矿务档》第2册，台北，编者刊，1960年版。
- 17、叶春墀：《山东草辫业》，京都华东石印局，1911年版。
- 18、吕伟俊、董宝训、李平省、赵兴胜：《山东区域现代化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
- 19、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20、匡裕祥：《烟台笔记》，《新游记汇刊续编》卷7，上海，1922年版。
- 21、朱世全：《威海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 2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 23、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24、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 25、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
- 26、佚名：《山东全省实业表》，13册，1908年写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27、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82年版。
- 28、张相文：《齐鲁旅行记》，《南园丛稿》卷4，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3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 29、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上海，编者刊，1934年版。
- 30、郑要：《烟台要览》，2册，烟台要览通筹局，1923年版。
- 31、林修竹：《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 32、国立山东大学化学社：《科学的山东》，青岛，编者刊，1935年版。
- 33、赵琪、蒋邦彦编：《开辟龙口商埠纪事》，龙口，龙口商埠兴筑公司，1920年版。

- 34、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
- 35、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2 卷，北京，三联书店，1992 年版。
- 36、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3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
- 37、海关总税务司：光绪十六年至宣统三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上海，1891-1912 年刊。
- 38、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 1 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 39、唐荃生等：《山东烟台青岛威海卫果树园艺调查报告》，北平，东亚文化协会，1940 年版。
- 40、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
- 41、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汇编》，8 册，青岛，文华印书社，1934 年版。
- 4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 4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版。
- 44、罗仑、景苏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
- 45、蒋桐生：《威海卫指南》，上海，朱锦堂印刷所，1933 年版。
- 4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1-3 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
- 47、刘素芬：《烟台对外贸易分析》（1867-1919），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
- 48、山东林业技术员训练所编：《山东农业概要》，济南，编者刊，1947 年版。
- 49、千家驹：《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上海，上海书店，1990 年版。
- 50、刘桐钧、董礼刚主编：《莱海招抗捐运动与辛亥革命》，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 51、李华著，《山东商帮》，台北，万象图书公司，1995 年版。
- 52、贾桢等修纂，《筹办夷务始末》，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
- 53、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年版。
- 54、《农商公报》
- 55、《东方杂志》
- 56、《食货》
- 57、《山东杂志》
- 58、《大公报》
- 59、《中华实业界》
- 60、《山东时报》
- 61、《申报》
- 62、《捷报》
- 63、《中外经济周刊》
- 64、《商务官报》
- 65、《中国农史》
- 66、《中国经济史研究》
- 67、《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
- 68、《近代史研究》
- 69、《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地方志：

- 1、杨维驄等修纂：嘉靖《山东通志》，1560 年刊。
- 2、赵祥星、钱江等修纂：康熙《山东通志》，1678 年刊。
- 3、岳濬、杜诏等修纂：雍正《山东通志》，1736 年刊。
- 4、杨士骧、孙葆田等修纂：宣统《山东通志》，1915 年刊。

- 5、施闰章、任睿等修纂：顺治《登州府志》，1694 年刊。
- 6、任瑄等修纂：康熙《登州府志》，1662 年刊。
- 7、永泰等修纂：乾隆《续登州府志》，1742 年刊。
- 8、贾瑚等修纂：光绪《增修登州府志》，1881 年刊。
- 9、高岗等修纂：康熙《蓬莱县志》，1673 年刊。
- 10、王文焘等修纂：道光《重修蓬莱县志》，1839 年刊。
- 11、郑锡鸿、江瑞采等修纂：光绪《蓬莱县续志》，1882 年刊。
- 12、山东省蓬莱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蓬莱县志》，济南，齐鲁书社，1995 年版。
- 13、山东省长岛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岛县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 14、何乐善等修纂：乾隆《福山县志》，1763 年刊。
- 15、于宗潼、王陵基等修纂：民国《福山县志稿》，1931 年刊。
- 16、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山区志》，济南，齐鲁书社，1990 年版。
- 17、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芝罘区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 年版。
- 18、李蕃等修纂：康熙《黄县志》，1673 年刊。
- 19、袁中立、苑天住等修纂：乾隆《黄县志》，1755 年刊。
- 20、尹继美等修纂：同治《黄县志》，1871 年刊。
- 21、张殿邦纂修：民国《龙口志》，1936 年刊。
- 22、山东省龙口市史志编委会编，《龙口市志》，济南，齐鲁书社，1995 年版。
- 23、王一夔等修纂：雍正《文登县志》，1725 年刊。
- 24、欧文等修纂：道光《文登县志》，1839 年刊。
- 25、李祖年等修纂：光绪《文登县志》，1922 年刊。
- 26、山东省文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文登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年版。
- 27、李天陟、岳赓廷等修纂：道光《荣成县志》，1840 年刊。
- 28、山东省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济南，齐鲁书社，1999 年版。
- 29、山东省乳山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乳山市志》，济南，齐鲁书社，1998 年版。
- 30、王士任、毕懋第等修纂：乾隆《威海卫志》，1742 年刊。
- 31、威海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威海市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 32、万邦雄等修纂：康熙《莱阳县志》，1678 年刊。
- 33、梁秉锷等修纂：民国《莱阳县志》，1935 年刊。
- 34、山东省莱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莱阳市志》，济南，齐鲁书社，1995 年版。
- 35、郑占春等修纂：康熙《栖霞县志》，北京线装书局影印本，2001 年版。
- 36、卫茝等修纂：乾隆《栖霞县志》，1754 年刊。
- 37、黄丽中等修纂：光绪《栖霞县续志》，1879 年刊。
- 38、山东省栖霞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栖霞县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 39、张作砺、贾绶等修纂：顺治《招远县志》，1600 年刊。
- 40、陈国器、象曾等修纂：道光《招远县续志》，1846 年刊。
- 41、山东省招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招远县志》，北京，华龄出版社，1991 年版。
- 42、杨引祚等修纂：康熙《宁海州志》，1672 年刊。
- 43、舒孔安等修纂：同治《宁海州志》，1864 年刊。
- 44、宋宪章、王昭旭等修纂：民国《牟平县志》，济南，山东印刷局，1936 年刊。
- 45、山东省牟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牟平县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 年版。
- 46、包桂等修纂：乾隆《海阳县志》，1742 年刊。
- 47、李尔梅、王敬勲等修纂：光绪《海阳县续志》，1880 年刊。
- 48、山东省海阳县志编委会编，《海阳县志》，编者刊，1988 年版。

- 49、山东省莱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莱西县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50、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上海,图书集成铅版印书局,1904年刊。
- 51、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北京,北平师范大学史地系,1924年刊。
- 52、[明]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
- 53、[明]宋濂等修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
- 54、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
- 55、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英文部分:

- 1、Armstrong, Alex. *Shantung, A General of the Geor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Province*, Shanghai: The Shanghai Mercary Office, 1898.
- 2、Forsyth, R. C. *Shanto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1912.
- 3、*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icennial Reports on Trade, Industies, etc.*(简称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1892-1901, 1902-1911, 1912-1921, Chefoo.
- 4、*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简称 Trade Reports), 1862-1881, 1882-1891.
- 5、I, A. Donnelly, *Chinese Junks and other native Craft*, Singapore: Graham Brash Pte Ltd, 1988.